[德]
埃米尔 · 路德维希
著
周京元 ——译

音符与铁血

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How to Treat the Germans

全彩典藏本

"二战"后同盟国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书

by
Emil Ludwig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铁血与音符：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作者:[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译者:周京元

ISBN:978750867897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译序

铁血与音符的德意志简史

“日耳曼人”（Germani）是古罗马对罗马文明世界的东北边境之外，莱茵河东岸、多瑙河北岸那些部落的泛称。这些部落大约使用着相同的印欧语系语言；由于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所以“日耳曼人”是个外来的称呼。罗马军队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高卢（今法国）时，即在莱茵河流域遭遇到日耳曼人，当时罗马人称他们为“莱茵河此岸的日耳曼人”（Germani cisrhenani）与“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Germani transrhenani）。

由于日耳曼人是许多部落的泛称，所以条顿人（[德]Teutonen，[英]Teutons）、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阿雷曼人、法兰克人等都是日耳曼人，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日耳曼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条顿人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开始倾颓，日耳曼各部落不停地在罗马帝国领土内迁徙，因而扩散在欧洲各地，这也使得后世学者在研究日耳曼历史和语言上更加困难。

“德意志人”（[德]die Deutschen，[英]Germans）一词源自古高地德语，是公元5世纪到10世纪之间居住在现今德国中、南部的日耳曼人所说的语言，在拉丁文中的书写法是“diutisc”，意为“人民的”，指的是当时日耳曼人所说的语言，而“德意志人”则是“说日耳曼人语言的人”。德意志民族意识兴起后，这个词就用来指德意志民族了。

如今，德意志人不一定是德国人，因为德意志人也可能是奥地利人或瑞士人。

而日耳曼则是指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现代英语的“德国”（Germany）一词即自此演变而来。日耳曼人有时会等同于现在的德国人，后世也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

德意志帝国的源起与没落

11世纪时，位于多瑙河附近的一个贵族被封为索伦伯爵，是为布尔夏德一世（Burkhard I），这是霍亨索伦家族在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考证的首

领。后来的索伦伯爵腓特烈三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忠实家臣，他通过联姻，成为纽伦堡—索伦伯爵腓特烈一世，并将家族名称改为“霍亨索伦”，意为“高贵的索伦”，时年1192年。自此开始，霍亨索伦家族从皇帝处获得不少领土，并且致力于通过联姻和购买的方式扩充领地。1415年，腓特烈六世购得布兰登堡选帝侯（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的身份，称为选帝侯腓特烈一世。之后，选帝侯腓特烈二世建设柏林市，使该地成为霍亨索伦家族的首都。1618年，布兰登堡选帝侯经由继承得到普鲁士王国；后来的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身为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并因其军事和政治技巧卓越，而被称为“大选侯”。1701年，普鲁士公国升为王国，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改称腓特烈一世，至此，普鲁士王国（Königreich Preußen）正式成立，首都为柏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即是腓特烈·威廉之父、腓特烈大帝的祖父。

“容克”（Junker）一词源自中古高地德语，本意是“尚未成为骑士的年轻贵族”。在普鲁士的历史上，“容克”多指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特别是东普鲁士地区，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土地和政府；到了1871年，俾斯麦统一各邦，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登基为德意志皇帝。成立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后，“容克”更是统治了德国政府和普鲁士军队。



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描绘的德国19世纪的街景，作品名为《格赖夫瓦尔德的集市》（*The Marketplace in Greifswald*），画于1818年。

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其孙威廉二世在1897年12月最后一次拜访俾斯麦时，俾斯麦曾提出宛如预言的警告："腓特列大帝死亡20年后发生了耶拿战役，普鲁士败于拿破仑；我离开20年之后，如果事情再这样下去，德国就会崩溃。"

1914年6月，塞尔维亚独立运动人士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德大公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意志帝国身为奥匈帝国的同盟，也因此向塞尔维亚及其联盟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

战事第三年，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成效明显，造成德国境内食品及原料不足，德国开始实施食物配给；1916—1917年的冬天严寒，马铃薯收成不好，人民不得不吃动物饲料和小萝卜，因此这个冬天也被称为"萝卜冬天"。整个战争时间，德国平民因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50万。德军在战场上的挫败使得国内动乱加剧，结果德国水兵哗变，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海军及全国。1918年11月9日，首都柏林也发生了革命，不同派系的政党在国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威廉二世不得已，只有宣布退位，放弃德意志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的王位，并带着皇族逃至荷兰。霍亨索伦家族对德国的统治就此结束。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8年年底成立的共和国是德国的第一个民主共和体制，采取议会民主制度，制定魏玛宪法，因此有时候亦称为"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但政体的正式国名仍沿用"德意志帝国"。1919年，魏玛政府与战胜的协约国签订《凡尔赛和约》，接受割地赔款、削减军备与军队，并承认极具争议性的战争罪责条款。

根据和约，德国共需赔偿2 260亿马克的黄金，并且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给法国，并限军队人数在十万以下，协约国同时实行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

这些情况导致德国丧失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不过德国的工业体系依然完整，本土也未受到战火波及，要复兴德国的工商业并非难事。



在“一战”之中和“一战”后，德国遭遇了严重的饥荒，数十万人饿死，但由于战争时期的消息闭塞，当时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图为德国版画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的作品《德国的孩子们

快饿死了！》（*Germany's Children Are Starving*）。

令德国政府与人民最反感，并且引发强烈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的，是强迫德国单独承受发起战争的责任："基于德国及其盟国之侵略行为，协约国之政府及其国民因战争而受害。协约国之政府，确认德国必须就其及其盟国导致的一切损失与破坏负责。"（《凡尔赛和约》第二三一条）德国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前军队将领随即开始质疑和约。他们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社民党人、共产党人、犹太人视为叛国者，是魏玛政权的既得利益者；犹太人尤其被视为是后方罢工及战败的主谋。这种观点在德国迅速引起共鸣，并被纳粹党作为主流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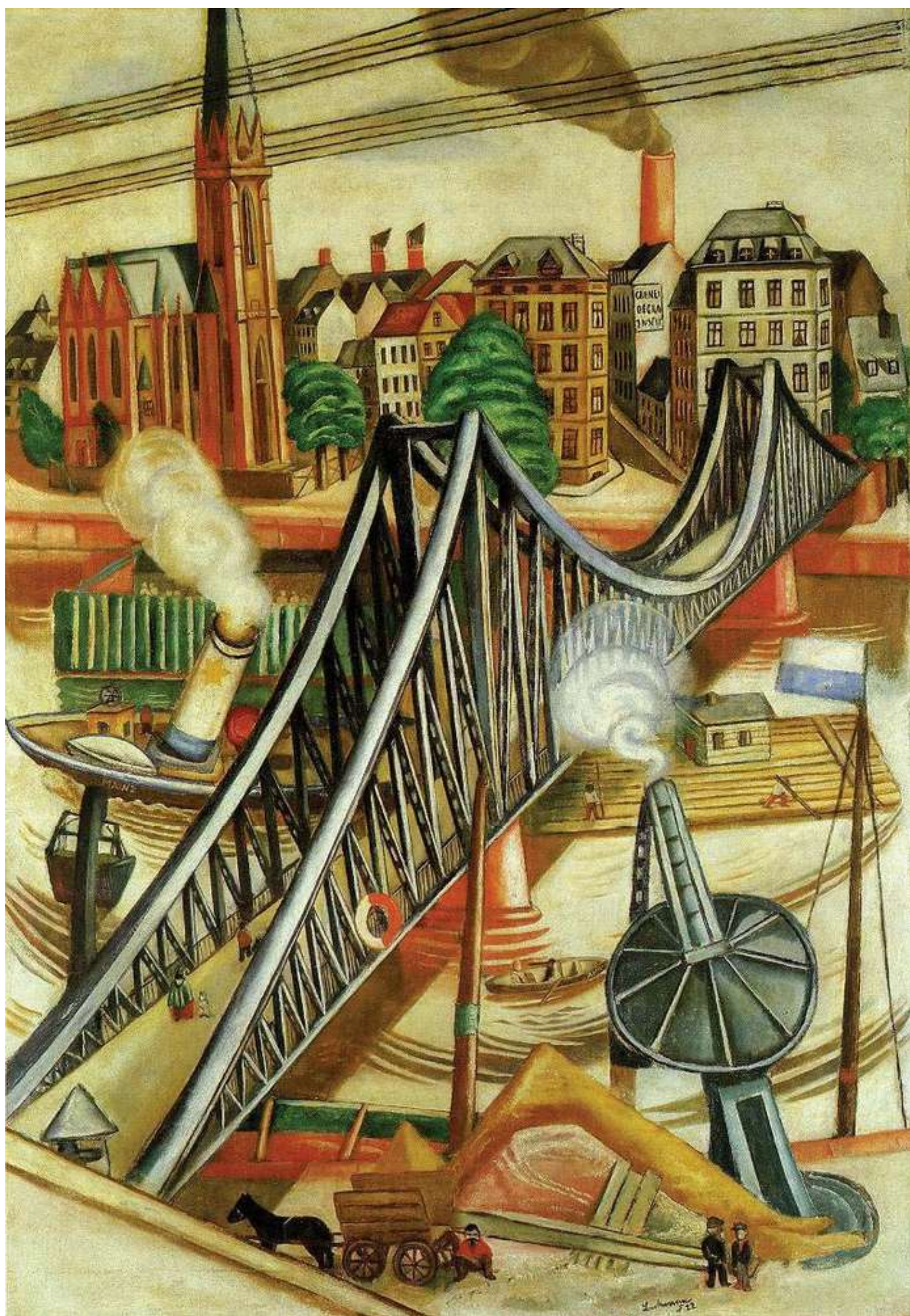
魏玛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竞争激烈，政变、罢工、暴动不断。德国政府在1923年表示无法应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战争赔款，因而拖欠赔款；这又导致经济衰弱，不得不印制钞票，导致德国货币疯狂贬值和通货膨胀。这时候，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并计划占领该市。政变失败后，希特勒被判监禁五年，但最后只坐了九个月的牢。他于是决定通过合法途径登上权力宝座。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und）虽然身为保皇党，仍决定参加1925年的总统选举。在当选总统后，他加强总统的权力，使总统的权力不再仅仅是象征。总理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于1929年过世后，全球经济大恐慌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得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在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1932年年底的国会大选让纳粹党得以晋升第一大党，因此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3月24日，兴登堡在国会纵火案后受希特勒影响，签署了《授权法案》，让纳粹党在未拥有国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无须执政联盟中的其他党同意即可通过任何法案。此举实际上等于废除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后，纳粹内阁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将总统职权转授给总理，希特勒因而成为"元首"（Führer）兼帝国总理，并成为德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所有官兵必须向希特勒宣誓。从此，魏玛共和国结束，纳粹一党独裁专制开始。

一个局外人和参与者

有些人怀疑，所谓的"德国民族性"是否真的存在。怀疑派认为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才成立，又采取联邦制度，由22个邦、3个自由汉萨同盟城市（汉堡、吕贝克和不莱梅）注和1个直辖区（阿尔萨斯—洛林）构成，而当中的22个邦则是由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及符腾堡）、6个大公国、5个公国和7个亲王国所组成。这些邦国各自有长久的历史与传统，各邦国的统治家族或许彼此通商、通婚，但也常干戈相见，各自的人

民也有着深层的邦国认同，要如何谈及这些邦国和自由市有共同的国家民族性呢？



德国著名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的作品《铁桥》

（*The Iron Bridge*），描述了画家眼中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法兰克福景象，画于1922年。

但是，本书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认为，“德国民族性”绝对存在，而且世人也应该好好讨论并认清德国的民族性。他表示：“民族性是真正的现实；它是一个国家各种特质的总和，使其国民容易受他人辨认——即使其中的某些特征可能无法在部分或个别国民中找到。”他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不论是在火车上、旅馆里或船上，多数人都能在一大群人中由头型、行走和说话的方式，直觉地判断一个人是“英国人、地中海人或是斯拉夫人”。外貌与举止是性格的象征，当人民的自然倾向经由国家利用教育进行培育和强化时，国家内部就能发展出国民的基本特质。路德维希曾在20世纪40年代大声疾呼他对“德国民族性”的看法。他的观点当时在美国的公众演讲和广播时深受听众支持。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曾邀请他作证，而当时的盟军占领区政府也邀请他讲述此议题。为何美国大众与政府对他的见解都如此洗耳恭听？

埃米尔·路德维希1881年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省的布雷斯劳（Breslau，“二战”结束后划归给波兰）。此地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1742年从奥匈帝国手中取得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布雷斯劳成为德国第六大城市，当时人口约有50万，而且包括大量的犹太家庭，路德维希家即是其中之一。

公元1世纪左右，犹太人便已定居在今日的德国地区，不过一直受到各种歧视；许多欧洲犹太人不但在政治与经济上没有自由，同时也不可任意迁移。到了18世纪中叶后，由于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欧洲开始出现“犹太解放运动”（Jüdische Emanzipation），消除所有对犹太人的法律歧视，并授予犹太人与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当时的普鲁士在对法战争失败后，决定团结普鲁士人民，并扩大社会与经济富强的基础，因此邀请犹太人入籍成为经济公民，也给予他们自由居住权。

德国在1871年解放犹太人，但规定境内的犹太人必须符合会说德语、改用德意志姓氏、有固定工作，以及拥有财产等条件，才能取得公民权。此外，德国政府又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必须为基督教徒，如果拥有公民身份的犹太人仍保有犹太教信仰，还是无法担任国家公务员、法律人员与教育人员等职务。埃米尔·路德维希的父亲赫尔曼·科恩（Hermann Ludwig Cohn）便因此在1883年去除犹太姓氏，改以中间名为姓，科恩一家人从此改姓路德维希。

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专业是法学，于1902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而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在1906年跑到瑞士开始了小说家生涯。路德维希曾担任《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驻伦敦记者，后来被派到巴尔干半岛

报道战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柏林日报》在维也纳和伊斯坦布尔的驻外记者。他在1920年出版了创作的第一本传记《歌德传》，将原始资料、史实与当时刚兴起的精神分析法结合，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带有戏剧效果的情节，作品因而畅销。路德维希在写作之际仍担任采访记者，在欧洲各首都访问其政治领袖，斯大林、墨索里尼、土耳其的凯末尔，以及捷克开国元勋马萨里克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采访。1932年出版的《与墨索里尼的对谈》（*Mussolini Gespräche mit Emil Ludwig*）一书，便是记录他在1932年3月23日至4月4日期间于罗马访问墨索里尼的谈话。

由于路德维希在其作品中公开讨论德国在“一战”爆发中的责任，严厉抨击右翼历史学家粉饰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做法，明确主张用和平主义与民主共和的思想来教育青年一代的立场，他开始在国内遭受抨击。德国历史学会宣称路德维希代表“德国社会精神状态的沉沦”，纳粹倾向的历史学者奥图·威斯特法尔（Otto Westphal）更攻击他是“俾斯麦的敌人”。外交官阻止路德维希在国外城市开设讲座，要求将他排除在诺贝尔奖候选名单之外；纳粹党籍的国会议员则抨击路德维希的作品“辱没了德意志人”，戈培尔甚至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路德维希的作品特别危险。路德维希受到多方攻击后逐渐淡出德国，于1932年入籍瑞士，他在瑞士居所的邻居包括以《西线无战事》一书闻名的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933年5月10日深夜，在柏林歌剧广场上的焚书行动中，路德维希的作品也被冠以“误解我们的历史，轻视我们历史中的伟大人物”的罪名遭到焚烧。

路德维希1936年在造访美国巡回演讲时，曾警告听众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并主张抵制德国。他还提出他对欧洲的愿景：成为一个宪法的“欧洲合众国”。后续几年，他一再预测“大战一触即发”，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果真挥军进入波兰。路德维希推测德国会入侵瑞士，身为德国公敌的他唯恐遭遇不测，为了自身安全，他在1940年决定流亡海外，移居美国。

路德维希流亡美国时，不断通过演讲或发表文章，警告世人切勿重蹈《凡尔赛和约》的覆辙。他是德国应承担“集体罪责”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描写德国人的独特民族性，告诉盟军在战后应该如何对待德国人，认为盟军应尽早了解德国民族性，因为德国也很可能像墨索里尼一样突然崩溃，让盟军措手不及。在这段时间中，他受罗斯福总统之邀，担任美国对德政策顾问，并为“二战”后美国初期推行的强硬改造德国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持。1945年1月，罗斯福和杜鲁门亲自邀请路德维希跟随巴顿、克莱顿和艾森豪威尔等三位将领前往欧洲战场，报道欧洲的解放。

路德维希在流亡美国期间可说是纳粹德国最强大的对手之一，他在演讲与写作中一再强调德国的民族性与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之处，并要美国注意德国的反犹太问题。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必将战胜纳粹德国，为了后世的和平，盟军必须消除德国的军国主义根源，并教导德国人民主的真

义。因此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三本重要作品，皆与这个目的有关。在1941年的《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The Germans: Double History of a Nation*）中表示有两个德国：一个是由歌德、席勒、巴赫等人构成的德国；另一个则是由腓特烈大帝、威廉二世和兴登堡等军人构成的德国。在本书《铁血与音符》（*How to Treat the Germans*）中，他则强调，由于这种双重的民族性，德国必定会不断发起战争；但过于僵硬地服从与信仰军国主义，也注定了德国的必败。盟军必须准备好德国随时会战败投降，并且要负起战胜国的责任，以强硬的手段与坚韧的意志教育德国人民，让他们学习歌德所代表的德国文化，不让德国再次发起大战。

在1945年的《德国的道德征服》（*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中，他更进一步阐述德国已经战败，盟军必须切实履行战胜国的责任，好好进行对战败国的工作，教育德国在未来不再发动另外一场战争。

在21世纪的今日，阅读《铁血与音符》仍有其必要，因为本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路德维希身为德国犹太人，他不仅是德国文化的参与者，也是德国社会的局外人。他可以深入了解德国文化，也可以冷眼旁观德国的社会变化。尤其是他以知名作家与采访记者的身份结识欧洲政坛领袖，并亲眼见证当时欧洲众多剧烈的政经变迁，他对于德国的观察更是难能可贵。即便文中字句可见情绪上的感触，本书仍是一部可以全面了解德国民族和时代精神的佳作。

周京元

---

1. 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汉萨”一词对应的日耳曼语词hansa的原意为“集团”。同盟形成于1356年，极盛时加盟城市超过160个，中心在吕贝克，1669年解体。

自序

我们现在之所以打这场仗，主因是在上次战争结束之后，协约国并未彻底了解德国人的性格。

如果协约国深入了解他们的敌人，如果协约国在1918年后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置德国人，那么近期的这场灾难便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法了解不久的将来仍会发生类似灾难。因此，那些明白德国人性格特质的人现在应该唤起众人，去注意某些重要事实；他们应该向同盟国提供宝贵建议。同盟国即将得到本世纪第二次胜利，但也可能是第二次失败。提出建议是我们感谢美国致力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方式。

大多数逃离德国的人都希望能返回祖国，重获因纳粹政权而失去的职位与影响力。所以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鼓吹给自由德国一个新的机会，这情况就像当年签订《凡尔赛和约》一样。

我身为自由瑞士共和国的公民，从年轻时就已定居当地，所以我与纳粹政权之间完全没有个人恩怨，我不会一厢情愿地想象德国在战争结束后会变成哪种国家。

1933年之前，我每年都会回到我出生的德国，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观察它，并将之与其他国家比较。我的研究结果早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版，也被译成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一直以自由主义和国际观点看待事情，使得我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十年就开始受到他们的迫害。

我在《歌德传》及《贝多芬传》两书中描写思想上的德国，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及《兴登堡》三本书中则描写政治上的德国，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一书中更试图将思想与政治两个德国结合起来。

一个民族的性格无法从统计数据或民意调查结果中得知。要明确一个民族的整体特质，只有从直接的体验、对其历史的了解，以及与各类人群和部族的接触中获得。有些人认为，由陌生人评估一个家庭的成员会比由朋友评估来得准确，这是错误的看法。美国人接受的教育中，包括一种“分析自己国家”的教育，并因而拥有与此相关的洞察力，所以在分析美国上，欧洲人自然无法与美国人相比。

本书是一个关于德国人性格的简短研究，书中有一些在德国战败后该如何

对待德国人的实用建议。而德国的战败很快就会到来。

接下来的章节内容主要来自我最近的演讲，其中一章是我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证词，其余则是在政府机构所做的演讲。

路德维希
1943年12月
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

日耳曼人的秩序与浪漫

高傲的德国爱国者坚持他可以独自存在。
同时，他僭取其他国家获得的成就。
坚持这些都是他的后裔，或最起码也是他的旁系亲属。

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德国人(注)的性格是不和谐的。最能表达这种不和谐情况的是德国成语："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in seiner Haut）。

德国人从来没有满意过自己的命运。他无法知足，一直在寻找超越他所拥有之物的东西。德国人是他自己所谓的"拼命向上爬的人"（Streber）。

在这一点上，他与努力想放轻松的美国人正好相反。

德国人汲汲寻找更多权力，而非金钱，即使纳粹成员也不例外。他们更喜欢从一个低阶职位上对下级发号施令，而不是在大房子里与同事一起寻欢作乐。整体来说，德国人不喜欢快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很认真，认为在工作时放松讲笑话是不对的。甚至在喝啤酒及打保龄球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忧郁，并不快活。他们雄心勃勃地不停规划和推动计划，产生的紧张气氛让他们无法安心放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耳曼人的记录，是他们在公元1世纪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在国王或领袖的指挥下，离开原始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如今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地区。追随日耳曼人脚步的英国人或北欧人，都没有这么早就开始流浪，而且流浪这么久。日耳曼人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向南方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征服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地区。最初，他们身上裹着兽皮、头顶戴着野生兽首所做的头盔来到南方；后来他们以艺术家、诗人、思想家等身份再度南下，寻找地中海的美景和快乐。

所有中古世纪和现代的文献都证明他们的流浪仅有部分是因受到权力欲的激发和对奴隶的需要。日耳曼人被内在的不安定驱动，离开了自己的森

林。

一种奇特的缺乏自信感让日耳曼人渴望拥有凌驾他人的权力，而且要受到他人的尊重。日耳曼人眼中的“他人”，是指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民族，他们拥有更富足的家园和较高的文化。雅典人建立卫城一千年以后，日耳曼人还在追赶着野熊进入原始森林；他们仍是野蛮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在日耳曼人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主要特质已经发展出来，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的方法是制服比自己富裕的邻国，建立一个以主仆为主的阶级结构，训练自己的青年人勇敢，并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一个有自信的人不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无论是在何种领域，或在德国人的整个历史上，向来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德国人一直在问：“其他人怎么看我？”就像是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他却不断地拉着领带、调整背心。

我们在德国艺术里可以发现这个基本特征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舒伯特的著名艺术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最后一句歌词是“你不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快乐”（Dort wo Du nicht bist，dort ist das Glück）；另一个则是歌德所写的《浮士德》（*Faust*），描述一名得到世界上所有知识的魔术师，他一生到处寻觅幸福和宁静，但无处可得。“去寻觅那一瞬间”，这个想要超越最幸福时刻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德国人在一生中所有的痛苦与经验。他想要荣誉，被尊崇；要权力，可以展现自己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实力。荣誉和权力，这两样东西对他灵魂的影响力比金钱更强大。安静地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一向都不是他的目的。

即使是现在的希特勒青年团[注]也不梦想得到更好的车、更多食物，或银行账户里有更多钱，他们梦想的是伟大、力量和征服。

这些基本的感觉已成为德国人的信条、一个神秘的信仰。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注]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国外寻寻觅觅，最后找到他们的顶峰。近千年来，德国皇帝挥军南下寻找罗马，后来的德国知识分子更循路去寻找精神上的伟大。

尽管德国人从未承认，但缺乏天生的自信表现在两个渴望上：征服比较快乐的邻居，接着将征服之举理想化。因此，残暴行为和神秘主义混在一起，使得德国成为一个征服者的民族和一个音乐家的国度。俾斯麦是最出色的德国人之一，他曾对朋友说：“音乐总是唤起我心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渴望：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田园诗般的宁静。”德国最出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将这两种渴望结合起来，让他成了一名伟大的征服者、诗人，以及

学者。



腓特列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年幼时住在母亲的西西里王国。1211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下，继承其父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六世遗留的王位，登基为日耳曼国王。1220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二世改革法律、重视外交，并鼓励学术。尼采称他是“第一个欧洲人”，

近代历史学者则称他为“第一个现代统治者”。

另外，在贝多芬的音乐里，田园诗般的慢板之后总是胜利的进行曲。尽管程度较弱且较不真诚，瓦格纳音乐的元素则是这两种气质的危险混合。发人深思且非常值得非德国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是一名瓦格纳迷，他不追求放松，但追求灵感。

王位与祭坛

德国的傲慢和自负与他们对服兵役的热情同出一源。一方面，缺乏自信让他们发展出指挥、命令他人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服从他人的狂热。

德国人视他们的国家为一座金字塔，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的一块石头，在他的肩膀上背负着另一块石头；他很有耐心地扛着石头，因为他可以将全部的重量压在他下面的人身上。这是他们发展出服从热情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理解德国人立正站在长官面前的喜悦程度。

条顿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所以很容易被训练成高效的战士，而且强壮又听话。不论是在今日，或是这两千多年间的任何时刻，身为一个战士总能让德国人满意。他喜欢被敬畏、喜欢受尊敬，但他缺少其他人都有的内在和谐感。他无法放松，因为他缺乏自我满足；即使他并不需要，也总是在寻找一个更高的头衔或职位。他小心翼翼地盯着法国这个富裕邻居的边境，并不是觊觎不属于他的法国水果和葡萄酒，而是他不喜欢看到法国人和平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却不理睬莱茵河对岸德国地区发生的事情。

这个金字塔的想法并不局限于公共生活和政府。它从军营开始，然后进入平民生活的各领域：公民的、学生的、工人的、公务员的生活。

因此，德国人在潜意识里变得猜疑，表现方式是不断地抱怨，也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德国式争吵”（querelles Allemandes）。德国人的国家——金字塔——在构造时必须非常准确，伫立在金字塔上的神必须是公正的。如果有任何一块石头认为自己不在应在的位置，或是认为自己扛的负担过重，他会马上抗议：这既不是因为自由的缘故，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要确定不能让稳固阶级秩序以外的人抢走任何一点好处。

服从和迂腐互补增强。德国人在他们的组织里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公平，就像其他国家的人看守着他们的自由一样，这样宏大的组织使得任何热诚和友好气氛都无法存在。这造成的压力随处可见，在每个办公室、公共交通工具里，甚至在电梯内，如果有人认为一个人占用了太多空间，盯着他的

眼光甚至能让他丧命。世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像柏林一般，会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遭遇数千个小小冲突，不论是在旋转门或在停车场上，因为在理发店使用护发液而起，或是午餐账单上有10芬尼注的差额无法交代而起。即使是多年前，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焦躁紧张气氛来临之前，我就注意到周遭频频发生这种情况。就像两名董事在银行办公室里互不信任，或像是邮件室的那些14岁的送信小弟，他们猜疑地监视着彼此，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午餐时间多出五分钟。

这解释了一个仅见于德国的奇特现象。只要政府当局与人民之间发生任何争论，围观者总会站在当局那一边。“团队精神”集聚在国家身上，据此可得到“上帝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因此，证人在法庭上总是谨慎恐惧，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为了博得法官的青睐。

这种态度也说明了“德国总参谋部绝无过失”的古老信念。法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总理或元帅一直是错误的一方，因此他们永远倾向于反抗。德国人潜意识中就认为他们的国王和元首是正确的，因此随时准备打击那些胆敢批评他们行动的饭桶或发牢骚者。甚至当战事彻底失利，而且这些责任直指领袖时，如1918年的情况，德国人仍会将错误的责任扛在自己与同僚的肩上，以证明他的神（即国家）不会犯错。他们对失败逃跑的凯撒注没有任何怨恨，战败的罪魁祸首兴登堡元帅被选为凯撒的继任者，以解救德国这座金字塔。兴登堡之所以被视为罪魁祸首，是因为他不顾自己的判断，继续打着无望的战争。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普鲁士及德国陆军元

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第二任联邦大总理，并在希特勒影响下签署《授权法案》，等于废除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为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铺了路。

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内容大同小异，用功的热情或多或少相同，不过英国的年轻学子或美国一般的大学生在漫步穿过校园时，他们抬起头，姿势轻松不紧绷。德国学生必须不断地听从学长的命令，只因为学长比他高出了一两届。

德国人会培育出与他们性格相似的警犬绝非偶然。这些警犬和主人的生活几乎相同，总是随时服从主人的命令，疯狂地攻击任何主人要他攻击的人。

对在长官面前立正的德国人之声调、姿势和表情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他全身看不到一丝厌恶的表情，却有一种高兴的期盼张力，等着长官下令以执行命令。在另一方面，他的长官则像一个偶尔展现出亲切感的全能之神，以显示出他的满意。如果有人能在公众事务的金字塔上爬得够高，高到可以一瞥领袖（管他是凯撒或元首）的鞋底，他就觉得人生是值得的。

只要有一大群德国人的地方，就必须有警察维持秩序。我第一次到英国，看到一部驶往赛马场的巴士，30人在车门侧面排成一排，安静等待车门打开。巴士周围没有任何警察，我以为我身在乌托邦。在美国，火车列车长的功用在于协助乘客，但在德国，列车长是乘客的上级。当他在车上喊乘客出示车票时，声音姿态会让人联想到狱警用军官般的口气大叫“立正”。

当他查到一张异常的车票，表现得就像秘密警察。但是，如果他真的发现车票无效，他就会像终于宣判被告有罪的预审法官，露出满意的神情。

德国人十分习惯只要有三四人，大家就组织起来的事实。这是他们受教育的方式。当德国人没有上司、长官时，他就会失去所有的秩序感。当德国人旁边没有警察，当他们被允许随心所欲地行动时，他们会觉得好像地震或洪水毁坏了他们生活的所有规则。然后，所有限制都解除了，他们的行为就像没有老师的小孩。德国人怎能期望自由？他们怎能维持自由呢？在还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他们既没有能力投票，也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





隆美尔（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1891—1944），德国陆军元帅，素有“沙漠之狐”之称。隆美尔除了军事能力之外，也以人道精神对待敌军士兵，并拒绝服从杀害犹太裔和英国突击队战俘的命令。他在战争后

期卷入推翻希特勒的行动，希特勒让其选择可享有荣誉地私下自杀进而保护家人，或受军法审判但全家送入集中营，隆美尔选择前者后服毒身亡。

塔西佗提及日耳曼人时，说他们准备为其领袖而死。当然，这类型的人拥有注定要走向军国主义的性格，他们一步步地发展成军国主义的性格，就像育种和训练让赛犬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性格是迂腐之源。蒙哥马利将军提及他在非洲轻易击败隆美尔时，便深知这一点。他说："我知道隆美尔从前怎么做。德国人总是重复自己。"

当然，德国人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只存在于最亲密的家庭圈子里。他们与朋友或同事相处时始终保持莫名的紧张状态：谁级别比我高？我必须先向何人打招呼？或谁向我打招呼？谁有权优先前行呢？所有的委员会、俱乐部、学校都是按照这个金字塔蓝图来组织，考虑餐桌上优先次序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内阁会议顺序的重要性。

但是，德国人在家里也可能会变得非常人性化，或如他自己所谓的深情、亲切。哦，是的，他在家里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放松，他也喜欢与孩子玩耍，照顾他的狗，在自己的花园里莳花弄草。他勤于阅读——或曾经勤于阅读。他对于学习的渴望部分出于好奇，部分则源自想要胜过邻居或朋友的冲动。只要哪里有德国人，哪里就有竞争。

对德国人而言，家里的食物量重于质。他甚至瞧不起法国人花这么多时间和心力在食物上。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优秀的主人。德国和俄罗斯是欧洲最热情好客的国家。

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德国人比较不依赖于舒适安逸，他倾向于在梦想中寻求放松；这时音乐就发生作用，成为德国人内心世界最深刻的表达方式。没有任何民族，不论是匈牙利人或捷克人，会让自己家里充满那么多音乐。音乐是德国人表达他们性格中神秘特质的最好方式。而在战士精神弱了许多的奥地利，不论是在公私场合或何种阶层，都能见到音乐的创作和改编。

德国人抒发内在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方式是旅行，这是源自他们对于南方及温和气候的向往。他们意识到自己呆板的特质，但总是无法抗拒地受到地中海地区的欢乐和阳光所吸引。虽然鄙视地中海地区人民平凡无奇的陈旧住处，以及他们容易满足的随和态度，但德国人羡慕他们的优雅，这正是德国人最缺乏的特质。德国文学和音乐里充满了对优雅和美的渴望。因此，当今的德国艺术家前往地中海旅行的动机，与中古世纪德国皇帝进军

南方的动机并无二致。



保罗和弗兰切斯卡（Paolo Malatesta & Francesca da Rimini），13世纪意大利里米尼的情侣，保罗与其嫂弗兰切斯卡偷情。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两人死后落入地狱。在这幅浪漫派画家谢尔菲（Ary Scheffer）所绘的图中，右方身着红衣者即为但丁。

比起其他国家的女性，德国女性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贡献或文明内在成长的重要性比较轻微。德国没有像《崔斯坦和伊索德》注这般煽动人心的伟大情诗，没有《哀绿绮思和阿伯拉的情书》注，也没有布朗宁夫妻注那样的情诗。德国没有像路易十五（Louis XV）和庞巴度夫人（Madame Pompadour）、但丁（Dante Alighieri）和贝缇丽彩注、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注这样的情侣。伟大的德国传说《尼伯龙根之歌》注中的冲突争的是荣誉和地位高下。当中两名女主人公布伦希德（Brunhild）和克琳希德（Kriemhild）之间的争吵，是为了谁该先进入教堂。

德国没有受欢迎或曾经在宫廷发挥影响力的皇室情妇；除了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以外，这里没有哪位女王曾经扬名历史。德国没有任何著名的情侣让人永志难忘，即使歌德和夏洛特·冯·斯坦也不例外。

在德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唯一被迫退位的统治者是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他将他的心献给了一名美丽舞者。拉赫·法恩哈根[注]和柯希玛·瓦格纳是仅有的两位在19世纪对杰出的男性有所影响的德国女性，但她们都有犹太血统。

在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上面还有一个人的国家，有两种特质却因为其本质上的民主性而无法在此发展起来，这两种特质就是信任与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与信任，尔虞我诈将是每日的常态，而恐惧则会影响人的思想和内心。

在视服从为美德、而发号施令也有其伟大之处的地方，自由是不必要的；德国人在1918年首度接触到自由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美国南北战争后获得自由的南方奴隶。



柯希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1837—1930），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的女儿，同时也是音乐家瓦格纳（右）的妻子。



夏洛特·冯·斯坦（Charlotte von Stein，1742—1827），魏玛公侯国的贵族，她在魏玛宫廷担任宫女时，认识了歌德与席勒，成为密友，并对两人的作品影响甚深。



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1786—1868），这位政治态度保守的巴伐利

亚国王因为与情妇的绯闻，导致人民对他的不满加深，因此在1848年革命时让位给长子。

这个国家在这样的氛围下成就了一个偶像：戈伦，一个未知的古代神祇。古代祭司不断鼓吹迷信，以提高他的权力。“王位”和“祭坛”是德国王公青睐的表达方式。路德教会信徒成为最忠诚的臣民，就因为路德称他的革命乃是“改革”，废黜教皇，给予诸侯无限权力，使他们成为新教会的首脑。他们从那时起开始支付教士工资。只有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因为精神领袖身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比较不受世俗统治者的支配。因此，属于最隐私的人性感情，也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竟被用来作为一种增加国家权力的工具。

这种态度变成教义，国王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最后遂成为国家法律。

法国和英国历史中都有许多国王和其臣民严重冲突对抗的记录。这些对抗往往发展成革命，国王因而被废黜，有时甚至被送上绞刑台或遭斩首示众。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德国人从未有过真正的革命。德国三个所谓的革命都仅仅持续数天或数周，结果都是人民受到残酷的报复。这些革命是1525年的农民革命，1848年发生于维也纳、柏林等城市的革命，以及1918年君主制度倒台的革命。1918年的革命实际上只是22名王子逃跑了，结束的时间则是在14年后希特勒掌权时。这三起革命没成功的原因是德国人宁可要秩序，也不要自由；宁可接受命令，也不承担责任。



戈伦（Golem），犹太教的黏土人偶，由拉比将法术灌注于黏土，制造出可行动的人偶。当拉比在戈伦额头写上“אמת”（emeth、真理）就能让戈伦动作；若字改为“מת”（meth、死），戈伦便会停摆。图中是20世纪20年代默片电影《戈伦》当中的泥偶形象。

我在1919年1月期间于柏林的所见所闻，听起来不免滑稽荒诞。

然而，这个秩序和服从的世界确实发展出一些优点。普鲁士国王教导士兵如何踢正步及擦亮制服纽扣，将精确度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经过三年军事训练之后，他们把相同的精确度和团队精神也带进了制作最精密的镜头、最好的相机和最安定的化学溶液。

德国人对浪漫和音乐方面的追求一直较他们对国家及制服的崇拜来得弱。年轻的办公室新人们感受到身为阶级制度一环的代价，他们羡慕那些袖子上臂章比较多或等级比他们高的人。如果你敢跟他开玩笑，穿制服的邮局职员会皱眉。站在邮局柜台后面，他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成为巨大机器里的一个小齿轮，这会比他有三个好儿子更令他自豪。

美国人非常看重个人责任感，因此售票处的每名职员在办公桌上都有一个名牌，让公众知道他的名字。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每个人在办公室里都是无名的。老师的儿子在学校也不敢跟父亲谈及个人私事。经历五十多年

之后，每当忆起童年在紧闭的窗口前等待邮局职员的情景，我至今仍无法忘记当时恐惧蔓延全身的感觉。当我跟政府官员说话的时候，我的背部仍然挺直，就像是我从前看到穿制服的人时会自动挺直背部一样。我还记得我和姐姐走在我们西里西亚（Silesia）小镇的狭窄人行道上，她当年是个20岁的姑娘。有两名中尉经过我们身旁，为了让出路给他们先走，两名中尉牵起我姐姐的手，将她拉到路边，就只因为穿制服的人有权先通过。

当然，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德国的男女对此都很反感，但没人敢大声抗议。当警察或医生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就不再是“个人”了。

跟在主治医生后面观看他巡察其“指挥”的医院是非常有趣的。他大声吼出命令，在走廊上迈步前行，就像一名陆军中士，白色医生外袍飞扬在身后，后面跟着三四个助理和几名护士。他走进病房，脸上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微笑，或是挂着“我主掌生死大权”的忧郁神情。然后，他冲着助理的脸咆哮出他的命令，再大步离开病房。他一迈出房门后，病人才眼见入侵结束而放下心。我看到病人在病床上坐起，向上司行礼。如果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自由的概念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创造性的力量？那怎么会有合作？公平又怎么可能发挥作用呢？

德国人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公平”（fair）一词，就如同他们没有“君子”（gentleman）一词。这两个词都是以其英语形式收入德语词汇。德国人自小被训练成战士，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运动精神和对游戏的喜悦。

德国是个没有嗜好的国家。

1914年，当第一批英国战俘被德国俘虏，他们向德国卫兵伸出双手想要握手时，德国卫兵却不伸手。他们不知道人们也可以向敌人微笑。在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注]，未获奖的德国人在现场制造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场面。他们无法忍受被击败，很粗暴地质疑裁判的公正性。

这种缺乏宽容促成了反犹太主义。为什么犹太人遭迫害发生在德国呢？为何不是在英格兰？犹太人生活在英国的时间几乎跟他们在德国的时间一样久，英国犹太人的人数与财富也和德国犹太人不相上下。如果外人有用且爱好和平，那么自信且心态平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承认外人的优点。在英国，一名犹太人能成为首相，此外也有一名犹太人担任驻印度的总督。另一方面，德国一直嫉妒这些“外国人”，却又利用他们。德国地区在这一千年来，每个世纪都曾出现过迫害犹太人和反犹太的暴动。

歌德在比较过犹太人与德国人后曾说，德国人“应该散布到世界各地，就

像犹太人将他们内心的善行散播出去”。这表示无论是德国人或犹太人，都不具备建立伟大国家的必要特质。

希特勒也比较了犹太人与德国人，甚至更恭维犹太人，宣称：“这世界只有两个强大种族，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犹太人。这就是我要消灭犹太人的原因。”

促成现代德国内部反犹太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犹太人拥有无数财富，反而是因为他们获得许多诺贝尔奖。德国大众恶毒地攻击犹太人，不愿承认犹太人自由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

一个没有烈士的国度

可是，如果自由的理想就如同上帝的理念，都是天生就存在人类的意识里，那么德国人也在寻找自由，不过他们却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找寻。他们在自己复杂性格的另一个层面中找到了自由，但那里远离现实；自由的理想在他们的梦中、通过他们的诗歌流传着。他们用象征性的诗句歌咏自由：

你从不想看

这被压迫的世界，

引领你的舞蹈

只有天空繁星。注

（这也就表明自由仅存在于星空，而不是地上。）这就是心智和国家之间注定不和的起点，决定了德国数百年的历史。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统治阶级的容克注、伯爵、王子始终都是缺乏文化涵养的战士，他们完全满足于权力和发号施令当中。另一方面，普通公民是政府的臣民，而不是它的创造者；他们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在1867年之前没有投票权。公民把注意力转向了商业、科学和艺术，因此，数百年来，阶级之间依然互觉陌生，没有相互理解：一个是缺乏文化却强大的官员和政治家阶级，另一个则是有教养却无权力的臣民阶级。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一奇观，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创造出音乐、文学和科学奇迹的民族，却在每一个世纪都发起了侵略战争。

受传统和教育之赐，贵族阶层制造出了优秀的官员，但缺少智识训练却造就出低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个原因导致一个拥有许多战士的伟大国度可以打赢战争、扩张边土，但是国家却被缺乏政治远见的领袖所支配。这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间、心智和政府之间永远不和谐的根源，而这种分裂在历史上相当独特。

德国社会的运作原理有点像是纽约第五大道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下层，一个孤独的人驾驶着车子，不受控制；在上层的平台上，艺术家和科学家舒适地坐着享受美景，不关心在下面的领路人是否知道如何开车。如果他不知道如何驾驶、如果车翻了，这些绅士会甚为惊讶。

诚然，在美国也有年长的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同时代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之间的思想差异。但理论和行动之间的较量在这个国家向来不是根深蒂固。在欧洲，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青睐莎士比亚，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喜欢拉辛[注]，而罗马的教皇和意大利的王子总会赞助最优秀的艺术和最先进的科学。

在德国近五百年期间，一些次要侯国的王公常以赞助当代的伟大知识分子自娱。但强大的霍亨索伦[注]家族除了那些对其个人目的有利的智识以外，从来没有承认过思想的价值。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天才在这里从未被正当地认可过。因此，汉斯·霍尔拜因远走英国；丢勒则前往意大利。德国只有少数城市曾赞助才子智士。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开普勒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最为人知的成就为开普勒定律。他的著作启发了牛顿想出万有引力定律。



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1497—1543），德国画家。由于当时宗教改革反对教堂悬挂绘画，专擅绘制肖像的霍尔拜因处境艰难，遂前往伦敦发展。他曾为英王亨利八世和朝臣们绘制许多肖像。



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丢勒藉由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理解，将罗马神话带进欧洲北方的艺术中，也使他成为该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最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公民根本不想统治国家。他们非常快乐地生活在一座梦幻岛屿上，拥有他们的哲学、音乐和科学。他们有时看到国家之船经过，可能会向船挥挥手，但他们更乐意让王子和国王统治国家，自己则安居在自己的梦中，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其他国家，例如沙皇俄国，一些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不时起身反抗，但他们不是被枪杀，就是遭驱逐出境。俄国争取自由的著名诗人和革命者多来自贵族。德国没有立碑纪念争取自由的英雄，也没有可夸耀的烈士。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500年，我们只能列出两个人名：霍费尔和布鲁姆。在德国没有人知道1848年遇害革命者的名字，但每一个征服过城镇的将军却无人不知其名。

心智和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延续了几个世纪。当帝国的征服战争无往不利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参与其中；但当帝国被朝代分裂而虚弱时，艺术和科学却蓬勃发展，影响世界。这些代表心智之人和那些代表权力之人理所当然的聚集场所应该是大学，其中有些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但是由于德国没有私人基金会，这些科学中心在过去500年都是由王公赞助，他们也挑选和支付教授的薪资。

杰出的医生、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确实都来自这些大学，但哲学、宗教和历史的教学总是控制在王公手上，必须为王公的利益效力。德国科学家或许能发表最具革命性的癌症或结核病理论，却被禁止自由写作有关国家、哲学、自由和政治的文章。教授群体是王公的仆从。



布鲁姆（Robert Blum，1807—1848），出身德国科隆的诗人和出版人，曾参与1848年革命。1848年革命是欧洲各国在当年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的统称。虽然行动大多都迅速以失败告终，但还是造成了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并间接导致德国统一及意大利统一运动。图中即是布伦行动失败后被处决的场景。



霍费尔（Andreas Hofer，1767—1810），1809年提洛尔（County of Tyrol）起义中，对抗法国和巴伐利亚占领行为的领袖。图中骑马者即是霍费尔。

由于这些原因，将国家观念神化的鼻祖黑格尔在柏林颇富影响力。

而比他更伟大的同侪叔本华却一直是个孤独的隐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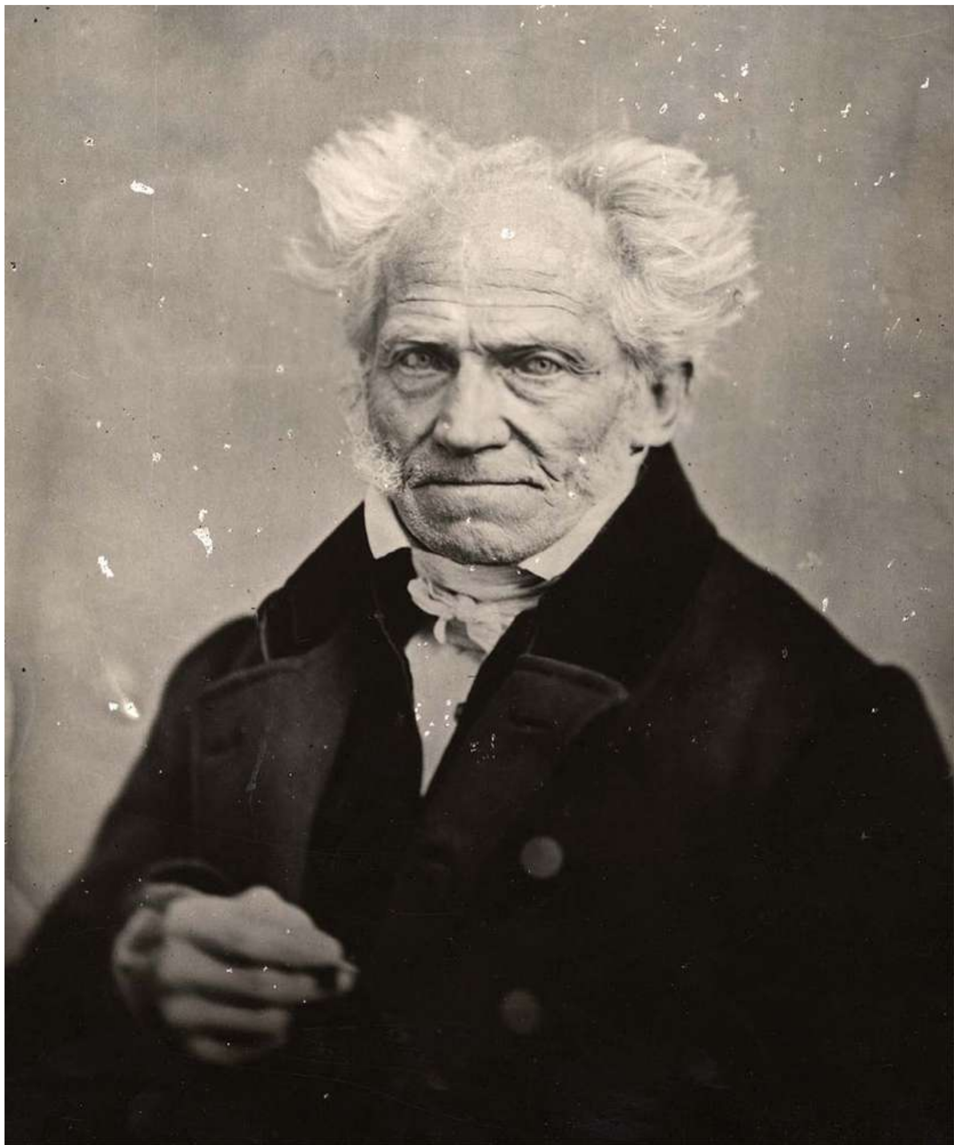
继马丁路德之后，康德是另一个能够表明伟大的人在受到掌权者威胁时会堕落到何种深渊的明显例子。只要康德所教的是对容克脑筋而言太过抽象的形而上学，当权者就会让他安静教书。他们也忽略他的“永久和平”建议——这是一个成立类似国际联盟组织的想法，康德在其中还称赞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体系。但当康德看到波兰被列强瓜分，他却保持沉默。后来当他捍卫宗教自由时，普鲁士国王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闭嘴，否则就予以辞退。这名伟大的天才脑海中有一个美好世界，他却不敢将抗议书送到国

王面前，这名国王是历史上最愚蠢的统治者之一。康德写给国王的信安全地锁在他的办公桌内，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才在抽屉里发现了这封信。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影响深远。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心灵屈从于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启发了日后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德国有一些很好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外国历史。他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外国历史，却无法独立且不偏颇地写出自己民族的历史。蒙森支持捷克的覆灭。约在1900年，有一名“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写了一篇对威廉二世的颂词，但没有多久之后，威廉二世就逃走了。

知识分子仰赖军国主义政府，迫使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将痛苦倾吐到私人信件中，这些信件都是在执笔者死后多年才得以公开。每个国家都受到并也应该受到自己最好的人才的批评。现今世界的混乱正是因为“不批评”已然成了风尚，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的职责是要夸大赞美自己的优点和才能。

然而，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像德国人一样辛辣地讽刺自己的国家性格。我们可以从马丁路德到尼采以及德国最好的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中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在德国心智和国家的两相分裂当中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

歌德在世时，他一直身陷在思想和行动、梦想与现实的问题当中。当歌德在魏玛公国担任首相，辅佐欣赏他的年轻公爵时，他曾尝试在法国革命前引进一些自由思想。歌德所写的论文耗费了他最多产的十年，也让他悲苦地确信了德国不可能允许一个宽容政府的存在。



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史学家，以研究罗马史著称。1902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蒙森曾是普鲁士和德国国会议员，他对罗马法和债法的研究，对德国民法典影响重大。



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末代德意志皇

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年至1918年在位。《凡尔赛和约》明定威廉为战犯，威廉二世逃至荷兰，但荷兰女王不理会协约国，拒绝引渡他受审。威廉二世余生在荷兰依旧过着奢华生活。

席勒成为德国公众心目中的自由诗人，歌德则被视为一生中都是王公贵族的亲密朋友。但歌德向来不是这种人，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他的观点完全扭曲、误解。这名最伟大的德国人对他的国家、他的同胞有许多尖锐的意见，我在本书每个章节的首页都列举了几个例子。

另一名试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治理德国的人是威廉·冯·洪堡。但武力传统在普鲁士地区甚至比其他地方更牢固，洪堡的尝试连一年都无法持续，仅仅维持了10个月。20年前（1922年），德国曾出现第3个天才型的人，他试图管理德国政府，但上任才5个月就被纳粹成员暗杀。他是德意志共和国出现过最杰出的人才：瓦尔特·拉特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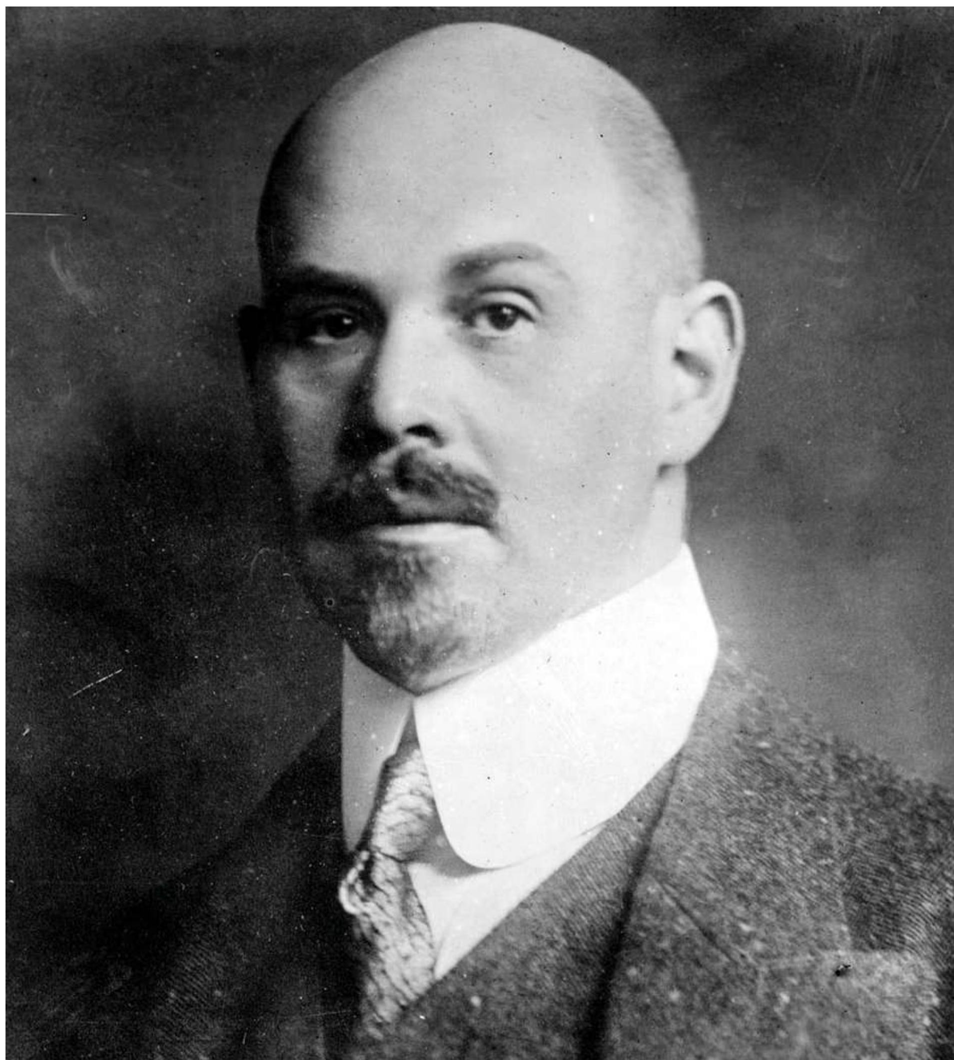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运动”代表者，也是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

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学者、柏林洪堡大学创始者。洪堡是普鲁士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也是一位外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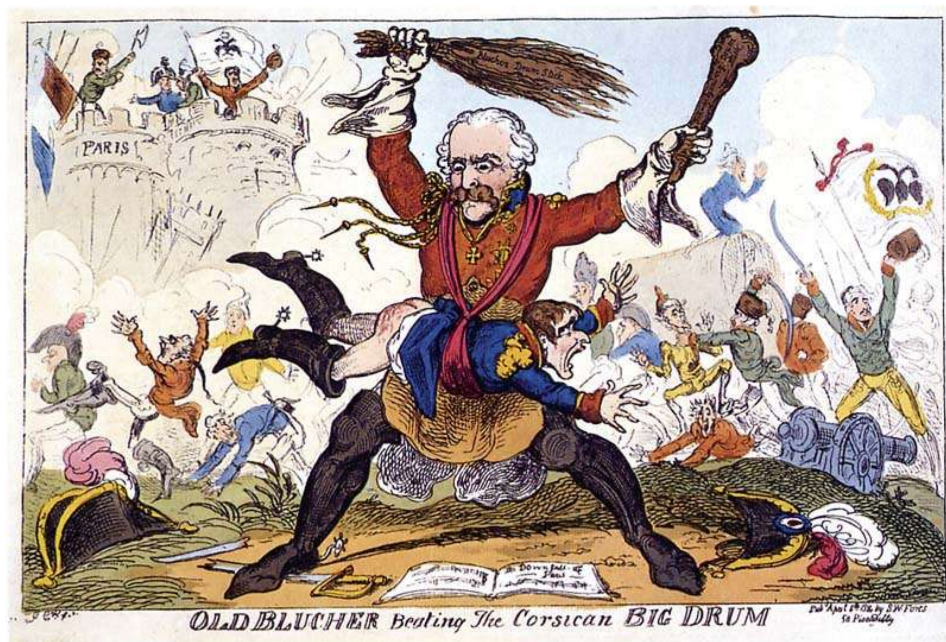
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犹太裔德国实业家、政治家、作家，1922年6月，拉特瑙因政治因素遭暗杀身亡。

在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留下了37卷的创作；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是作家；威尔逊（Woodrow Wilson）能成为总统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在英国，人们认为政治家曾经就读牛津大学、理解经典、写过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法国，从黎塞留注到赫里欧注，历来的传统是以艺术、文学、哲学作为政治生涯的优秀垫脚石。

但德国没有这种传统。将军，包括那些受欢迎的将军无不粗鄙，就像布吕歇尔一样。唯一的例外是毛奇，但他出生时是丹麦人。兴登堡不但不学无术，甚至以此自豪，他夸耀自己除了军事书籍以外，从来没有读过其他书本。

1914年8月2日，由于德国总理必须身着制服在国会公开宣读皇帝的战争消息，兴登堡因此突然被晋升为陆军上校。

这种当权者的反智倾向及德国知识分子不顾现实的态度，解释了一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一个充满丰富诗意天赋的民族竟没有创作出一部关于德国的戏剧。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席勒曾写过七八部历史剧，但当中只有一部与德国历史有关。浮士德也许是唯一可视为类属德国的戏剧人物。德国没有像莫里哀（Moliere）或莎士比亚那般水平的喜剧，因为德国人缺乏幽默感；德国人就和浮士德博士一样，永远在寻找和谐的那一瞬间。



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带兵风格以雷厉风行著称，这张讽刺画即是嘲讽其带兵残暴。



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毛奇曾领导

德军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在1870年色当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德意志统一贡献重大，受封伯爵，并于次年晋升元帅。

这些都是德国性格根本分裂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诸如由气候、地理环境和历史演进所造成的原因。

---

1. 日耳曼人（[德]Germmanen；[英]German）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部落的总称。凯撒（Julius Caesar）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统称所有莱茵河以东的民族为日耳曼人。日耳曼是指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现代英语的Germany一词即从中演变而来。德意志人有时会笼统地译为“德国人”。条顿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公元前二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渐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后世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
2.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纳粹党成立的青年组织，主要成员是14至18岁的德国青年男性。当时青年团遍布德国及德国控制的区域，以及海外的德国社群。
3. 神圣罗马帝国是公元962年至1806年以德意志地区为核心的欧洲封建帝国，从1512年开始的全称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4. 芬尼（Pfennig），德国货币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德国的法定货币曾历经三个主要阶段：1873年至1914年的金马克（Goldmark）；1924年至1948年为帝国马克和帝国芬尼；1948年至2002年则是德国马克和德国芬尼。
5. 凯撒（Kaiser），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时期对皇帝的称呼。
6.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6—117），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元老及历史学家。
7. 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二战”时的英国陆军元帅。
8. 《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and Iseult），12世纪法国长诗，描写骑士崔斯坦和爱尔兰公主伊索德之间的爱情悲剧。1865年瓦格纳曾改编为同名歌剧。
9. 《哀绿绮思和阿伯拉的情书》（*Héloïse & Pierre Abélard*），阿伯拉是12世纪法国神学家与作曲家，哀绿绮思则为其情人。

10. 布朗宁夫妻（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 Robert Browning），19世纪英国夫妻档诗人。

11. 贝缇丽彩（Beatrice Portinari）是但丁创作《神曲》的灵感来源。

12. 欧洲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出于政治动机，弗兰切斯卡被许配给马拉泰斯塔。马拉泰斯塔自知丑陋，特派弟弟保罗前往与弗兰切斯卡见面。弗兰切斯卡以为自己的未婚夫就是保罗，深深爱上了他。婚后，她仍暗中与保罗幽会。马拉泰斯塔闻知此事后，在妒恨中将妻子与保罗杀死。

13. 《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是以中古高地德语创作的英雄叙事诗，完成时间约在12世纪末期前后，但作者不详。

14. 拉赫·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19世纪初知名的欧洲沙龙女主人，出身于柏林的富裕犹太家庭。

15. 分别指1932年第十届夏季奥运，以及1928年第九届冬季奥运。

16. 诗句摘自东普鲁士诗人冯·申肯朵夫（Max von Schenkendorf，1783—1817）的诗作《自由》（*Freiheit*）。

17. 容克（Junkers）指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

18.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

19.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为欧洲的三大王朝之一，是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主要统治家族。

20. 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时期的宰相。

21. 赫里欧（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及作家。

普鲁士人的理智与疯狂

> 小心点，他们是普鲁士人；
>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有两种人能代表日耳曼的两个惊人极端：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这绝不仅是两个皇室之间的对比而已。就算过去曾经只是两个皇室间的对比，但现在绝对不是，因为皇室已经消失25年了。这两个地区的气候大不相同。

奥地利像半个南方，盛产水果、葡萄酒和美丽的风景，这里的人更像意大利人，而不像德国人。纯粹的天主教教育、不同的族群相互融合、维也纳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商业中心，创造出了一种国际视野。

混合的文明和较为轻松随意的生活使得这些奥地利人没那么穷兵黩武，更重视美感，也更为温和；换句话说，奥地利在各方面都比其北方的兄弟更加可亲。他们的国家成了音乐的故乡。

哈布斯堡家族并未创造这种气质，但他们是这种气质的象征。虽然他们大部分的战争都失败了，但帝国藉由联姻与聪明巧妙的条约，依然得以扩张。女性在奥地利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也为统治王朝建立榜样。有十几名德国凯撒出身于奥地利皇室，他们与其他欧洲皇室通婚，因此哈布斯堡皇室虽然在600年间只出现过三个伟大的统治者，但这个家族占据王位的时间却超过其他所有的统治王朝。

另一方面，德国北端是普鲁士，当地遍布沙质平原，要将土地变成适合种植黑麦、马铃薯或蔬菜的良田，则有赖俭朴、辛勤的农民。这个国度里没有葡萄酒，罕见美丽的风景，水果也是稀缺的。如果与奥地利的音乐和田园诗般的风景相比，这里有的则是散文。这个地区混居住着各种北方斯拉夫民族，他们是最不像日耳曼人的斯拉夫部落与普鲁士人，他们在容克地主的统治下，开垦这块崎岖贫瘠的土地。

日耳曼皇室霍亨索伦家族从德国南部移居到此已整整500年。他们继承——有部分则是靠征服——取得日后的普鲁士地区，但他们并没有将南方风韵的记忆带来北方。

柏林在维也纳建城一千年之后才成形。这座城市处在一个孤立且不宜人居

住的地方，无法自行开发商业或文化，更遑论发展艺术和音乐。普鲁士人曾是并且仍是最平凡无奇的德国人。

普鲁士贫困，其人民必须过着辛勤、斯巴达般的生活，使得普鲁士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扩张的需求和战士本能。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普鲁士地区的大地主跃升为贵族，成为有力的统治者。没有旅人会造访这片宽阔的沙地，或告诉这些劳苦如牛马的农奴，远在莱茵河畔的城镇或奥地利部分地区的人民拥有许多自由。这里和其他日耳曼地区少有往来，400年来也未见任何一个普鲁士选侯或国王曾被选为凯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下的好官员全力支持他们的国王，他们要求特权，而且也得到更多的特权作为奖励，而欧洲其他封建政府绝不会给予诸侯如此优渥的特权。这些容克占据着军队和政府的主导位置。平民仅有的权利是为他们的主人做牛做马，而后为国王而死。他们从来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生活。

普鲁士的平民和农夫不得不服兵役，服役时间往往长达30年，这种情况在腓特烈大帝时期仍无改变。一个农夫获准每年可回家四个月，一来照顾他的农地，二来生产报国，为国王制造下一代的士兵。在德国，最屈辱的身份是普鲁士的平民，他们得不到任何正义，更毫无权益可言。平民完全仰赖自己领主的残酷意志，甚至他的路德教会牧师也不敢挺身反对领主，因为牧师的薪水都是由容克们支付的。这个最有效的控制手段让容克成为自己庄园里的专制国王，生死大权皆掌握在手，庄园内的臣民连呼吸都得听容克的。

他们就像纳粹政权下的党部头目（Gauleiters）。

这种系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即使当时俄国和美国已经废除奴隶制度，东普鲁士的农奴制却继续存在。容克称它是父权制度，贫困民众称它为天意，史学家则称之为奴役。在这样的氛围下，文化和自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布拉格和维也纳拥有自己的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但柏林在1810年之前没有一所大学。在宗教改革后，路德将德国王公们捧为他们领地里的教会领袖，普鲁士选侯和国王因而比天主教国度的王公们握有更大的权力，完全驾驭了他们的子民，控制了所有学校。

军国主义的生活规则并不局限于兵营里，军事纪律在普鲁士无处不在。普鲁士到了19世纪仍然罕见平民可独立学习、研究，就连那些奥地利供人民放松、享受用的公共剧院和音乐厅在这里也极为罕见。在练兵场上随处可见的军事服从，悄悄地从家家户户的后门进入人民的家里和心中。这情况过去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如此。三岁儿童穿着制服，手拿木枪、头戴头盔，昂首阔步地走着。在回答学校老师问题时，孩子们那种立即专注回答的样子，就像是士兵一样。即使是今天，正宗的普鲁士人要是看到美

国男孩边和教授谈话，边坐在椅子上嚼着口香糖，仍会对这种脱序景象大为震惊。

制服崇拜遍及各行各业，这种崇拜不仅在腓特烈大帝时代存在，就连在我年轻时的威廉二世时期，任何一个自重的女仆或厨娘都必须要和一个穿制服的士兵出去散步，有钱人家的女儿也会以跟一名中尉在溜冰场滑冰为荣。世界知名的教授会将“预备役中尉”这个头衔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就在他们响亮的大名底下。他们会以“一个健康的凯撒战士诞生了”这种方式在报上宣告儿子出生。普鲁士教授最快乐的日子是皇帝生日那天，因为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他可以用特权阶级成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可以将发福鼓胀的腰围塞进旧军制服里，这件磨损的制服曾跟着他度过开心的兵役期；他这天又可以穿上制服，胸前戴上所有的徽章，跟着游行人潮走在街上。





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der Große，1712—1786），史称腓特烈大帝。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让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取得霸权，迈出以武力统一德意志的第一步。他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在政经、哲学、法律、音乐上颇有建树，是启蒙运动的

重要人物。

大多数的普鲁士政府官员每天都穿着制服。面对平民时，他们总是采用军队命令式的语气。每位老师、每名邮局职员也是如此。这种狂风似的咆哮并非天生残暴的结果，即使是心肠柔软的德国人也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履行国家的神圣任务。于是，当穷人或寂寂无名的“臣民”来买邮票或缴税时，对他们说话就必须表现得像个傲慢的贵族或残酷的士官长。一道难以逾越的墙隔开了身穿制服的男子与其他比较不高尚的民众。有一次，我收到一封英国税务局的来信，我非常惊讶，因为信尾签署的话极为礼貌：“您恭顺的仆人”。在德国，即使最不起眼的官员在写信给世界知名人士或知名企业的总经理时，小官员也绝对会以这样的句子起头：“你被要求报告（或审阅、或出现、或支付……）”，结尾一定是秘书也难以辨识的签名。

大帝与将军

霍亨索伦家族在这样的体系中兴盛了大约500年，在此期间只出现过三名优秀的统治者，另外17个统治者则非常平庸，不是乱花钱，就是尚武的斯巴达人。霍亨索伦的军队由“大选侯”在1650年左右建立。他们扩大领土的手段是威胁和征服，而最特别、最成功的方法则是将他们的邻国出卖给外国势力。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所有其他国家在19世纪都已奄奄一息，只有奥地利仍是可能的对手；但碍于性格和教育，奥地利人根本无法成为普鲁士之流的士兵。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人称“军曹国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注]，一手创建了普鲁士的军队和政府体系。腓特烈·威廉一世碰巧是一个比他的问题儿子更坚实和直接的人。他的统治当然是军事专制，带有严厉的经济计划，但那当中没有他的个人野心。所以，被称为“国家第一仆人”的不该是腓特烈大帝，而应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擘划并开发出一套运作良好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正是他。他对抗造反的容克，并建立了一支包括83 000名官兵的庞大军队。

威廉一世建立的青少年军事教育体系非常残酷，常以棍棒甚至酷刑管教，但普鲁士人并不讨厌这种军事教育；他们从来不反抗，最后便被塑造成这位军曹国王冀望的听话、高效的士兵。这种只有军事训练的教育，创造出了为战而战的欲望；士兵们迈步走上战场，却不知道也不在意为何而战或敌人是谁。这样的军队会发展出攻击而不是防御的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德国人不是好的失败者。德国军队在进攻时非常杰出，但在撤退时可就士气溃散了。

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经典战役结束之后，德国人只输过两场战争：第一次是1806年对抗拿破仑的战争，当时普鲁士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注）；再者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在1918年时没有为可能的撤退或内线防守做任何准备，在拥有半个欧洲的情况下，德军一失败，24小时内就全军弃战了。同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再发生。

普鲁士士兵在过去300年来被教育要服从，却不明白原因。尽管有现代的宣传手段，尽管有收音机，普鲁士人的消息仍不灵通，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只听得到单方说辞，也没有批判性新闻来刺激公众讨论。普鲁士“盲从”（Kadaver Gehorsam）的旧观念虽仍可激励士兵勇猛且成效显著地进攻，却给不了他们在防御时应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

“军曹国王”威廉一世的统治是欧洲数百年来最愚昧的时期，唯一能超越他的仅有希特勒。任何文化的展现，所有文明的精益求精，都被他称为是“萨尔达诺帕路斯（注）的狂欢”。这位军曹国王仅有一项喜好：他的军队。但他没有孤注一掷地将军队投入实现主宰世界或种族优势的战争大梦，他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军队，但并未发动战争。威廉一世就像待在家中的贤慧家庭主妇，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待军曹国王一驾崩，年轻的腓特烈便迫不及待地利用他父亲的宏伟战争机器。腓特烈大帝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多年后他承认，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出自他的野心。随后战争接二连三，20年间不曾中断。整个战争最后的战利品只是一个贫穷小省西里西亚（注），但代价却是百万人的性命。

美国大众对腓特烈大帝有一个非常扭曲的印象，使得美国人对普鲁士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由于普鲁士视英国为敌，腓特烈有一段时间曾支持美国革命，美国人因此视他为英雄，加上他曾经拉拢伏尔泰（Voltaire），所以也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冯·斯托本是一名成功的美国将军，又正好是普鲁士人，结果腓特烈就被大众誉为美国的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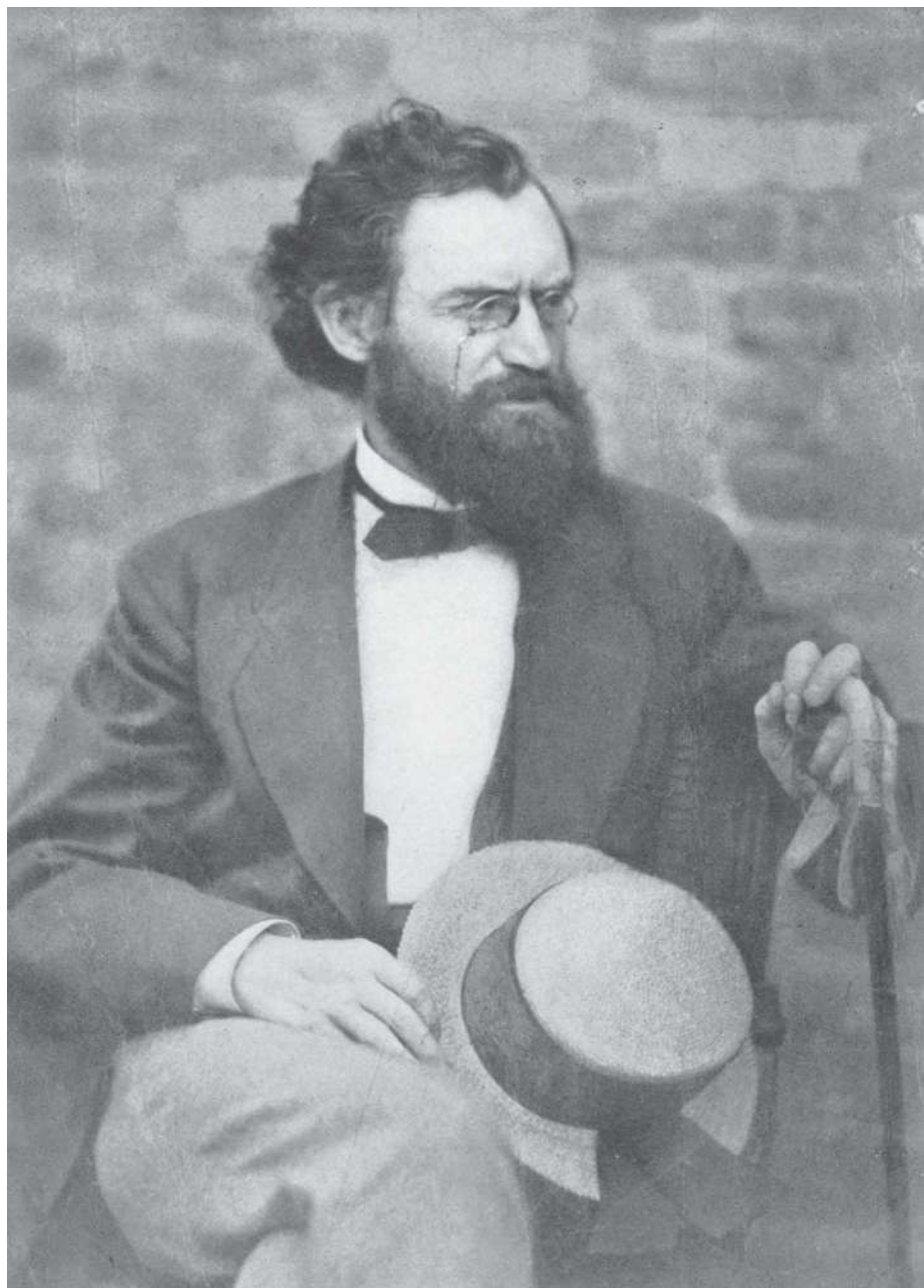


冯·斯托本（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1730—1794），普鲁士人，1777年参加美国独立革命后入籍美国。

但事实正好相反。当拿破仑宣称腓特烈大帝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我们可以相信拿破仑的专业眼光。就算腓特烈大帝时常卖弄地说些他敬佩法国自由思想家的话，但他绝非自由主义者。身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他是当代最薄情的暴君，在道德上远远低于他的对手——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

皇。尤有甚者，冯·斯托本将军在效命普鲁士王国之后，竟被忘恩负义的国王解雇，甚至遭到流放。冯·斯托本因此不得不移民法国，他在巴黎认识了圣日耳曼伯爵（Count of St. Germain）。伯爵将他介绍给华盛顿将军。冯·斯托本随后便带着法国提供的资金和武器，驶向美洲大陆。

另一名前往美国、被当地人视为来自普鲁士的人，事实上并非普鲁士人：卡尔·舒尔茨。他的家庭来自莱茵河地区。莱茵兰[注]被割让给普鲁士不久之后，卡尔·舒尔茨出生于此。莱茵河两岸的人民过去和现在都一样鄙视普鲁士。当舒尔茨以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身份回到德国旅游时，他过去的敌人俾斯麦首相邀请他留在故乡为祖国服务。但舒尔茨拒绝了俾斯麦的邀请，舒尔茨的举动被视为是美国道义上的胜利。



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1829—1906），1852年移民美国，1877年任美国内政部长。

移民美国的德国人并不代表典型的德国人。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的德裔美国人，他们的父辈祖辈协助建立了美国，他们自己对祖国的了解仅来自偶一为之、带着浪漫情怀走上回乡之路的夏季旅行经验。他们充满热情地支持德国皇帝，以及之后那位所谓的“元首”。他们身在美国这个安全的避风港，希望看到德国这个世界强国能掌握在强人的手上。

正如我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所描写的腓特烈，我们今天了解的腓特烈大帝的真实事迹，正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故事，清清楚楚地表明他的政治哲学即是残暴和专制。腓特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专制君主出马，他们就为所欲为；他们发动战争，让勤奋的法学家去找出理由。”这听起来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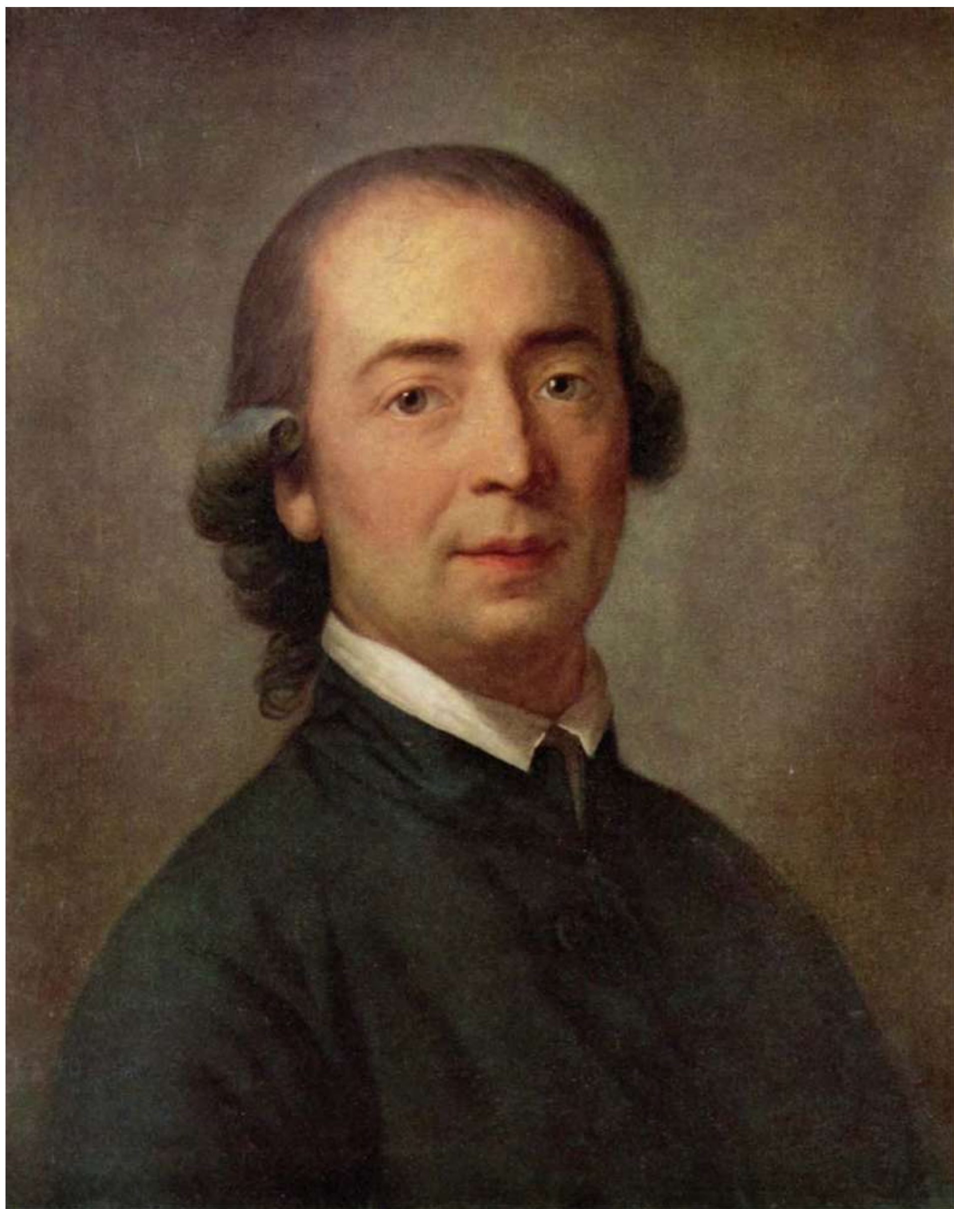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

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最著名的剧作是《智者纳坦》。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家。温克尔曼的著作不仅影响了考古学领域，对西方后世的绘画、雕塑、文学，甚至哲学亦有启发。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和诗人。他的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影响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美学则影响了歌德和尼采。

腓特烈常引用自由哲学使徒、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话，但他

让自己的子民拥有的自由，甚至比“太阳王”路易十四给他臣民的还少；如果绑架和抢劫外国公民对他有益，腓特烈也不会在乎。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分子——莱辛、温克尔曼、赫尔德无不鄙视腓特烈，赫尔德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在逃离祖国时还诅咒着腓特烈。腓特烈侮辱歌德、贬低莎士比亚。腓特烈唯一见过面的天才是音乐家巴赫（J. S. Bach），但腓特烈却没有让巴赫得到他期望的宫廷管风琴家职位。如今，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唯一能让我们回想起布兰登堡显赫历史的作品。

音乐家、俾斯麦与希特勒

普鲁士创造出了自己的哲学。在柏林，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说：“除了更强者的权利以外，国与国之间没有法律、没有权利的存在。”黑格尔宣称：“战争是永恒的，战争是道德的。”现在仍然有些强国或多或少地相信这一点。但将之当作宗教，由教授讲道宣扬，要求神灵祝福，并采用哲学家的学说来崇拜暴力，这是普鲁士自己的发明，希特勒只不过是沿用普鲁士的旧配方。最先宣告“德国神祇”的是普鲁士人，而且他们早就公开宣扬“日耳曼统治世界”，比希特勒还早了半个世纪。

在我们谈及普鲁士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让我们细数普鲁士有多少伟大的心灵对德国整体才智做出贡献。德国名人堂里面没有一个普鲁士人，这座名人堂里有古腾堡和开普勒；画家方面有丢勒、克拉纳赫[注]和16世纪的霍尔拜因；宗教方面有路德。接着是德国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文学方面有歌德、席勒、莱辛；还有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格鲁克、海登、莫扎特、舒伯特，还有后来的韦伯、舒曼、瓦格纳；哲学家方面则有莱布尼兹、叔本华、黑格尔。这些人全都来自德国西部或南部，或是萨克森州（Saxony）和汉萨（Hansa）共和国。康德、贝多芬和洪堡是半个德国人；门德尔松[注]、奥芬巴赫[注]、海涅、马克思（Karl Marx）是犹太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

这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逻辑。除了普鲁士自己，没有其他地区的人会认为普鲁士属于德国特性的一部分。各方都同意德国民族的灵魂肯定是来自莱茵河，那里的历史和传说、诗歌、美酒和音乐创造了德国生活当中的精髓。来自德国各方的人不会为了东部的西里西亚和波森[注]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只会为莱茵河和西部的古老城市奉献生命。



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古腾堡印刷术在欧洲迅速传播后，在随后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歌剧作曲家。格鲁克在哈布斯堡宫中担任宫廷乐师多年，曾经是路易十六妻子玛丽·安东瓦内特的音乐老师。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9），作曲家。韦伯的著名歌剧《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他的堂姐康斯坦泽是莫扎特的妻子。



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哲学家、数学家，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各自发明了微积分，在哲学上则以其“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他和笛卡尔、斯宾诺莎被公认为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理性主义哲学家。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浪漫主义诗人、新闻工作者。他和卡尔·马克思在1843年相识后，就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然而，普鲁士绝对统治了德国。在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国家统一之际，德国自由主义者尝试了半个世纪，以一统德国。他们充满善意，脑子塞满了

美丽的想法，但这些教授和作家缺乏从政经验，这些意识形态怎么可能成功地对抗普鲁士军国主义已建立数百年、如同钢铁般的教条呢？德国平民从来没有坐下来讨论过国家的未来。当未来终于来临时，它的形式是在法兰克福召集一个没有选举权的前置议会。这些人选了谁担任第一任总统？哈布斯堡王室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公。

当有人提议普鲁士国王登基成为德国皇帝时，他用他那招牌理由拒绝了这项荣誉："我不会接受由尘世之手奉上的皇冠；皇冠必须来自上帝。"

1848年，柏林和维也纳的群众发动了400年来的首次起义，他们试图以武力获取40年前君主承诺给他们的权利：在政府里拥有影响力，以及拥有投票权。然而，普鲁士的刺刀迅速将柏林和南部所谓的革命镇压下来，结果反动行动随处可见。

20年后，身为容克的俾斯麦成功地在未询问德国人意愿的情况下以武力统一了德国，这当然是普鲁士的风格。不过，俾斯麦的观点更广泛且更宏大，在普鲁士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俾斯麦出身于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鲁士容克家庭，他的才智继承自母亲。

他的家庭出身平民，但以优秀的法学家和立法者著称。尽管俾斯麦才华洋溢，但要是没有男爵的头衔和容克的高大身材，他可能永远无法获得保守派国王的信任，并从中获得无限的权力。俾斯麦在许多方面都不是典型的普鲁士人，从他对朋友的选择就可证明。在最吸引他的两名女性当中，一名是俄罗斯的公主，另一名则是英国女子。而他从青年到过世前仅有的两个密友，一名是波罗的海小国的伯爵，另一名则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莫特利。

俾斯麦所有最亲密的信件都是写给莫特利的。



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

官。

尽管最近有许多人拿俾斯麦与希特勒相比，但这样的比较非常荒谬。就像他们喜欢的作曲家分别是贝多芬和瓦格纳一样，这两个人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反差。不令人意外的是，在普鲁士进攻奥地利之前，俾斯麦家中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希特勒这个装腔作势又歇斯底里的演说家当然是一个典型的瓦格纳迷。他的目标脱离现实，有种要征服世界的神秘和无限渴望，就像那些中古世纪凯撒的梦想。

俾斯麦的愿景非常清晰：他要团结德国人、让他们强盛，而不是增加领土。就如我们所说的，俾斯麦以普鲁士的手法，用武力和暴力征服德国各诸侯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统一无需使用武力，但俾斯麦是少数知道打败对手后要踩刹车的政治家，而他踩刹车的点就是奥地利。俾斯麦以最大的毅力，甚至是人身威胁，阻止了得胜的将军踏进奥地利。他与奥地利在1866年签署的条约可确切地称为是现代史上第一个“威尔逊和平”协议：没有要求领土或赔偿。

俾斯麦在1871年不得不屈服于国王的意志，向法国索讨了阿尔萨斯（Alsace）省。他开给法国的和平条件与希特勒开给法国的条件天差地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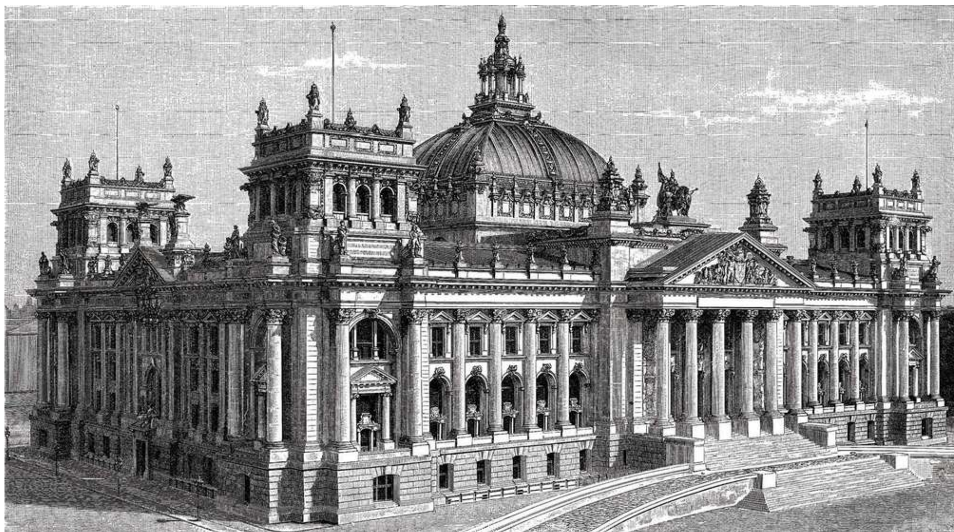
俾斯麦在1885年开创了社会保障，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还早了50年。当然，这是由上向下的下令行事，就像完成帝国统一也是下令行事，或者复兴德意志帝国也是如此。但当俾斯麦在1871年于法国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的基础，让普鲁士的威廉国王成为威廉皇帝时，他邀请了德国平民和各界代表团到场观礼，让德国人民见证王公诸侯的决定。国王被迫接下德意志帝国的皇冠。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前几年，也就是1867年，德国人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他们没有能力自治。他们终于获得选举国会的投票权，这个国会必须起草一部未来一统帝国的宪法。当终于到了投票决定国会是否有权对内阁投信任票时，80%的人投了反对票，可以说国会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说明了他们害怕责任，而且缺乏自信。

国会大厦位于柏林的大广场上，国会大厦前面竖立着帝国创始人俾斯麦的巨大雕像。他身着帝国将军制服，脚穿高统靴，腰际配着长剑。但靴与剑并不是俾斯麦喜欢的配饰。

在国会大厦后方，几乎被国会建筑的阴影遮盖住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小型建筑，这是总参谋部，普鲁士真正的心脏。路人经过时会偷偷瞄一眼，说话时也会压低声音，总是害怕这小房子里可能有什么秘密。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片决定德国命运的纸页从这里送出来，这张纸上过去会有国王或皇帝的签名，如今则是“元首”的签名，而且未经前面的国会许可便直接公布。



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Reichstag一词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本意为国会，后来则专指这座位于柏林的国会大厦。此处曾先后作为德意志帝国议会和魏玛共和国议会的会址，“二战”后遭到废弃，1999年起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的会址。

这张纸就是动员令。德国人喜爱而且总会接受这些命令。

这一切在俾斯麦的手中都很安全：二十多年来，他谨慎地避免卷入新的战争。他非常清楚德国地理位置的危险，周围有三大，甚至四大强国环绕。

俾斯麦多年来都反对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他是德国日益壮大的帝国主义的最后一道阻碍。对于普鲁士国王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世袭总统，他很满足，这就是他对德国凯撒的愿景。

在英国拿下越来越多的殖民地之际，俾斯麦是第一个反对德国竞逐殖民地的人。至于这个骄傲的人心中的无奈，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德国性格才能得知。俾斯麦深知，唯有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才适合成为“商人冒险家”。德国人极度有效率和组织，却无法成功地创立殖民地。他们试图把国内金字塔型的系统移植到赤道地区。我在1912年参观过那些殖民地。在非洲就如同在柏林，都是由臣民服务国家，而不是国家服务人民。德国这个不自由的民族根本不适合统治当地不自由的人。

俾斯麦被解职后，威廉二世便立即带着傲慢和威胁的语气，宣布要主宰世界。威廉二世是个典型的颓废继承人，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残缺，他所受的教育让他努力掩饰自己的缺陷，成为强人。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在同一个时代竟两度崇拜歇斯底里的领导者。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之间的相似度如此惊人，希特勒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甚至常被称为“威廉三世”。

德国人偏好过度情绪化、戏剧性的领导人，这件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只要个性健全，都会寻找健康且均衡的人来领导。美国人在160年间从未选出一个歇斯底里的总统。英国的历史上也没有疯狂的首相。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两人都很异常，无论是他们的行为，或质疑他们怪异性格的报告都再三证明这一事实。



伯恩哈迪将军（Friedrich von Bernhardi，1849—1930），普鲁士将军和

军事史专家。其最知名的著作是《德国与即将到来的战争》（*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Krieg*），书中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了纳粹意识形态。

典型男子汉的俾斯麦在主掌德国政府的28年间，遭到人民憎恨和恐惧，只有在他被解职以后（或许这是主因），德国人才开始喜欢、尊敬这位德国的“元老”。在威廉二世时代，伯恩哈迪将军和其同道开始发表有关世界霸权的著作，当中的内容很有煽动性，有非常类似纳粹的宣传文字。这个普鲁士将军写了一篇有关美国总统塔夫脱注的文章，其中写道，在美国，塔夫脱总统提出了强权之间的仲裁条约。这些条约必须遭到阻止和推翻，必须在舆论上赋予战争以道德理由。必须让大众了解战争具有价值，是最有力的文化推动力量……战争能让人性做出最崇高的行动。个人的残酷和弱点在整个理想主义之前消失……像德国这样一个刚起飞的国家，尚未达到政治和国家的顶峰，仍依赖其权力的扩张，所以一般的仲裁条约对一个这样的国家是有害、具有毁灭性的。

威廉二世蓄意破坏海牙（Hague）的和平决议，并写下无法翻译的句子：“我他妈的××整个决定！”（Ich scheiße auf die ganzen Beschlüsse!）

有两个德国人的智识正好与首相俾斯麦相反：一是瓦格纳，崇拜贝多芬的俾斯麦不喜欢瓦格纳，但50年后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世界，影响更大的并非俾斯麦遗留的精神，而是瓦格纳的音乐思想。二是尼采，但今天的纳粹理论并不是完全出自尼采手中。的确，尼采是反民主的，他发明了“强主道德”（Herrenmoral）一词，并用此词描述非常有天赋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德国人。尼采对德国这个国家的矛盾与不平的理解更甚于歌德。他写道：“当我想象是哪种人违背了我所有的本能，最后总会发现原来是德国人。我无法忍受这个种族，他们总是让其他人身陷佞徒损友之间，又没有区分细微差别的能力……我觉得，奴隶尚未获得解放的黑色大陆就在德国北方附近……条顿人的定义：服从和长腿……日耳曼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他们了解‘陶醉’的艺术……所有真正的条顿人都出走到国外。目前的德国处在一个前斯拉夫时代的阶段，正准备迈向泛斯拉夫欧洲之路。”

军人、犹太人与美国人

德国在俾斯麦首相任期内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没有备战或发动战争，当时德国人刚投入工业，300年的军事训练此时转向了和平的活动。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精神贯穿了德国的工厂、医院和造船厂；那些始于大选侯，并由腓

特烈大帝的父亲继之灌输给士兵的军事操练，如今在蔡司、克鲁伯和泰森的工厂依然继续进行着。

这世界也许还不明白，在近年来的1910年和1930年这两个时间点上，德国本来有机会成为欧洲的工业和商业领导者。他们的严谨和勤奋、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质朴要求、他们天生的不安和狂热的努力，让他们较法国和英国更有成功的机会。

这本来会是平静的生活，但“征服”这个字眼的古老魔力并不允许这种生活继续下去，和平的努力变成了世界大战。德皇威廉和希特勒这两个发动战争的人让德国在本世纪丧失了它在和平时期的成就及造福世界的机会。我们无法想象美国总统会于1900年或1920年在华盛顿对全世界宣布：“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又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要宣战，征服加拿大或墨西哥。”美国的公众舆论对这样的建议会强烈地说“不”，但德国的传统则是说“是”。

在一开始，协约国并不确定最后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今的情况更是不能确定。但是，德国在1918年战败有四个特殊的原因。

过去的普鲁士统治阶层可以声称自己的优点是为人廉洁，不会被收买。

在我童年时代的德国，教授和将军是无可怀疑的，他们甚至对金钱不感兴趣，他们追求的是荣誉。将军和政府部长都很穷，比较低阶的贵族家庭甚至得节俭度日。他们的女儿常得自己缝制舞会礼服，因为儿子在精英军团服役，所有家庭收入都必须留给从军的儿子使用。

随着威廉一世的死去，这种普鲁士式的简朴也随之消逝。威廉一世一辈子都睡在铁制行军床上，享寿90高龄。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立即将税收比例调高了近一倍，好为自己购买各种奢侈品，并发展出跟后来的希特勒一样低劣的品位。由于宫廷生活奢华，普鲁士的容克们试图模仿这种生活也就不足为奇，结果情况演变成伯爵们开始要儿子迎娶有钱但无贵族头衔的家庭、银行家和实业家的女儿，甚至迎娶犹太家庭的女儿，以便为自己的家庭增加财富。这现象正好让漫画家可以借题发挥，成为丰富的作画题材。

如果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封地的王子，美国的社会结构不会濒临崩溃。金钱当然有其地位和权威，不过，当对金钱和地位的渴望让人开始赞成贵族与工业或金融界联姻时，普鲁士军官和政府官员这种廉洁特权阶级的金字塔就开始从基础动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后，普鲁士军官的道德与40年前战争时相比已大不相同。在1870年，德国军官就连一只小杯子也不会偷，或许有哪个士兵会从法国农场上牵走一头牛，因为这类事情自从人类发动第一次战事时就出现了。但从1914年到1918年，贪腐现象几乎和今日的德国一样普遍。我曾亲眼目睹普鲁士的高阶军官从罗马尼亚有钱人家中抢走皮草和白银。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虽然向来不以诚信著称，但此时他们也只能绝望地站在一旁，看着近东古文物堆在巴尔干特快车的货厢内，一路驶向德国。

统治圈里不断增长的财富丝毫没有削弱这群人对文化的蔑视：渴望更多财富自然鼓励了对征服战争的期望。德国人蔑视和平主义者，结果发展出一种信念，认为任何崇尚和平的人都是无赖，都是自己国家的叛徒。

德国在1918年战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威廉二世个人的懦弱。当年他的祖父威廉一世还是在俾斯麦的强迫下，才不得不从危险的战场上撤退。在四年战争中，威廉二世毫无军魂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德国人对君主制的同情。这个20年来成天演讲夸耀要征服世界的人，如今竟然连前往战场的胆量都没有。

战败后，普鲁士容克指责新建立的共和国是公众士气衰弱的原因。实际上，削弱普鲁士军人精神和德国人尊重国王传统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从凯撒开始的“军阀”不得体的行为，这才是造成普鲁士斯巴达精神崩溃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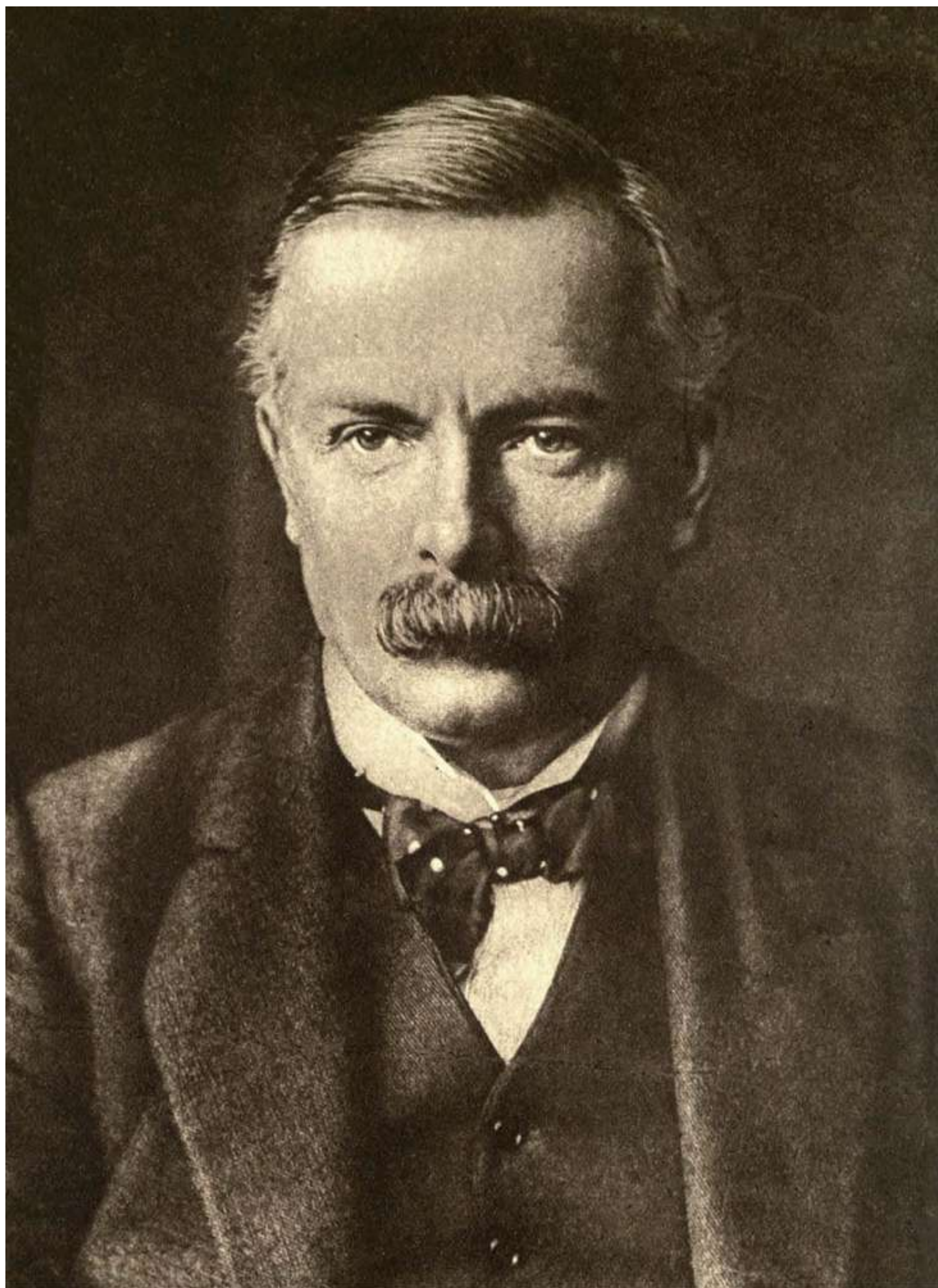
德国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差劲的外交。德国的外交官都是来自毫无文化可言的统治阶级，这个国家重要的外交职务从未让有脑子的人担任。

统治者给人民灌输对于美国的可笑想法，认为美国人没有战斗意志。当一名老容克在国会起身大喊：“美国人怎么可能来到这里？他们没有船，也不会游泳！”我亲眼目睹他们喜不自胜地大笑。

全国上下都相信这种愚蠢的言论，就算到了今天，也应该变聪明了吧，但德国人至少还有半数相信戈培尔广播宣传时所说的：“侵略延迟了，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仍在吃早餐。”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执政后，戈培尔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即是将纳粹党所列禁书焚毁，对德国媒体、艺术和信息的极权控制随之开始。希特勒自杀后不久，戈培尔便在毒杀六个亲生子女后随之自杀。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大英帝国，击败德国。他也是巴黎和会的主要与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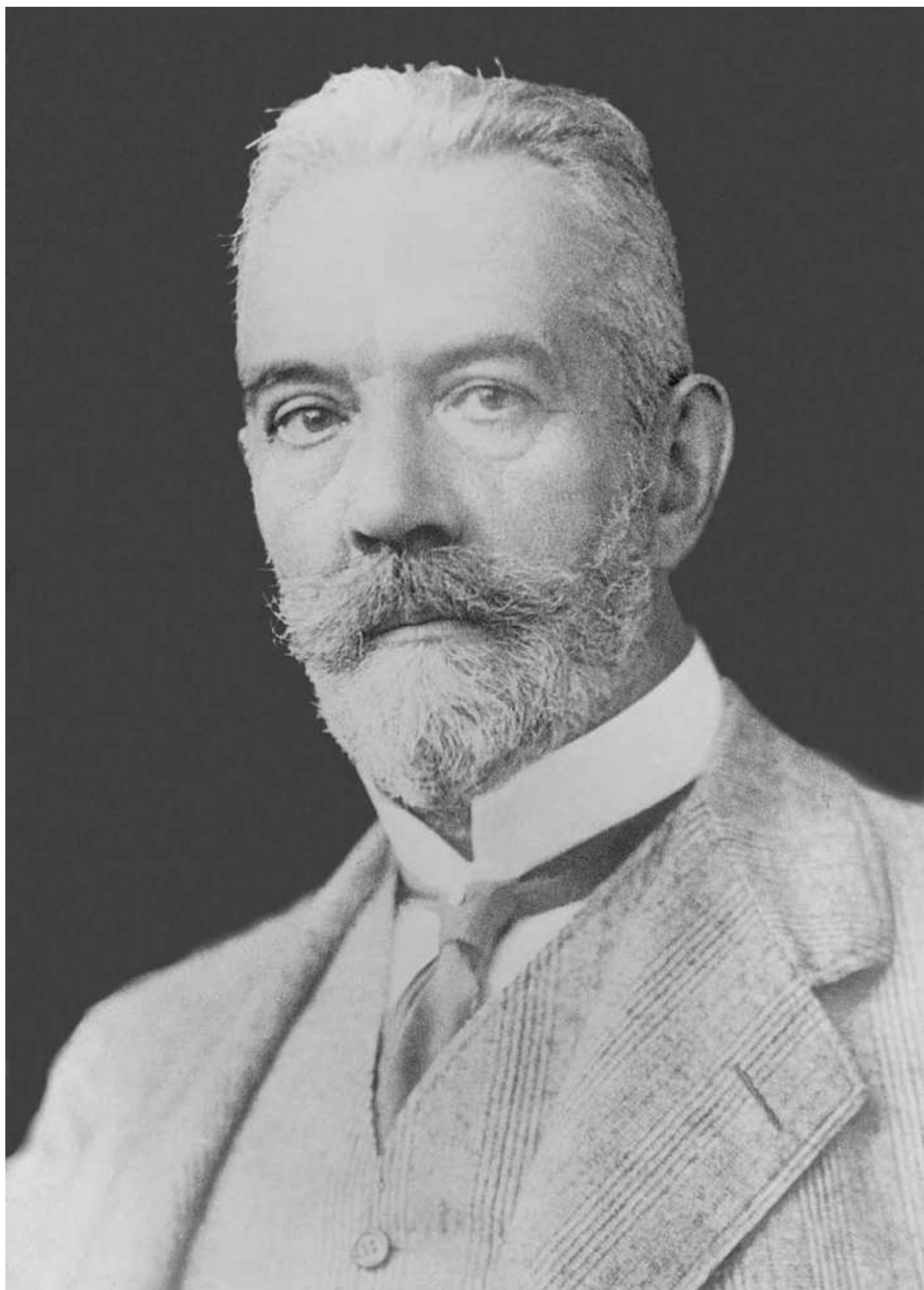
当劳合·乔治谈到协约国的“银子弹”，这让德国人觉得自己就像虔诚的十字军，是在发动圣战对抗异教徒。赶赴战场的德国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为永恒的理念奋战。

最后，知识分子彻底的错误导致德国输了这场战争。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阵营也许能找到一个共同平台，在1917年与法国和英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建立共识。这样的阵营或许能加强少数几名出国寻求与协约国接触的社会主义领袖的实力，但德国的教授继承了他们的神圣传统，称赞所有将军们认为值得称道的事物。冯·比洛亲王后来告诉我，尽管他身为总理，却没有人告诉他总参谋部已下令入侵比利时。将军们独自、绝对、不受干扰地进行统治，直到战败。当贝特曼—霍尔威格总理宣称“需要知道，不用理会”时，全德国，包括哲学家在内，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93名最重要的德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共同宣言，宣称违反比利时的中立是道德的、公正的、非凡的。除了极少数的独立知识分子外，德国教授、诗人和艺术家全都百分之百地支持将军们侵略比利时。为什么？



冯·比洛亲王（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德意志帝国时期担

任总理。他曾说："且让别的民族分割大陆和海洋。我们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德国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这句话揭示了德国在20世纪初的对外扩张政策。



贝特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意志帝国总理。他在费迪南德大公于萨拉热窝遇

刺后，促使奥匈帝国采取强硬行动，导致大战爆发。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每一个科学家、医生、作家，不论他是何人，或从事何种专业，都以穿上军服为无上光荣。布吕宁注治理德国两年，很久以后向我承认，说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他参战的那两三年，先是二等兵，后来升为中尉。

普鲁士的犹太人对战争特别热衷，试图比非犹太人表现得更像个普鲁士人。即使在今日，许多犹太人仍为“可怜、被误导的德意志民族”辩护，他们还存着重回德国故乡的梦想。对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些人的爱国心不是不足，而是过剩。1918年，当所有穿着光鲜制服的容克从前线躲躲藏藏地弃械逃回德国之际，德国知名企业赫伯罗特轮船公司（Hapag Steamship Line）的创始人、著名的犹太航运大亨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就在凯撒遗弃了他的国旗、逃离德国的那一天自杀了。他无法忍受活在自己认为的耻辱当中。而这位凯撒后来又活了二十多年，身体健康，而且生活富裕。

当美国人在1918年来到欧洲要终结战争时，他们在德国的声望甚巨。美国人被视为创造奇迹的骑士。但是，当他们两三年后要借钱给德国并和德国有生意往来时，德国人对美国的崇拜却立刻烟消云散。德国人不理解胜利者为何要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跟他们和解。美国人真诚地想帮助德国人，但此举却被德国人视为软弱和恐惧的表现。

美国人这次肯定会再度展现出他们的勇气，但他们不应该又在胜利后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唯有如此，德国人才会承认美国人是胜利者。德国人必须感受到恐惧，否则，他们会立刻变得霸道、咄咄逼人。

---

1. 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Ⅰ，1688—1740），1713年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兼布兰登堡选侯。

2. 指1806年10月的耶拿会战（Jena-Auerstedt）。

3. 萨尔达诺帕路斯（Sardanopalus），古希腊作家描写传说的亚述国王，以放荡纵欲闻名。

4. 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的一个区域。奥地利战败后割让给腓特列大帝，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此地在1945年后，绝大部分属波兰所有。

5. 莱茵兰（Rheinland）指的是中欧莱茵河两岸的地区；普鲁士在1822年将此地划分为莱茵省；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军队禁止在此地区驻扎。

6. 克拉纳赫父子［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和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1515—1586）］皆是德国著名画家。

7.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作曲家。

8. 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歌剧作曲家。

9. 波森（Posen），1849年至1919年间是德意志帝国的一省。

10. 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美国第27任总统。

11. 蔡司（Carl Zeiss，1816—1888），在1846年创立卡尔蔡司公司（Carl Zeiss AG），生产光学产品。

12. 克鲁伯（Friedrich Krupp，1787—1826），在1810年创立了钢铁厂。

13. 泰森（August Thyssen，1842—1928），在1891年成立采矿公司。

14. 威廉一世逝于1888年3月，其子继任为腓特烈三世，但在位仅三个月即因喉癌病逝。当年6月，腓特烈三世之子登基，即为威廉二世。

15. 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总理。

世界误解了德国

> 瘟疫在这民族上！勉强重获自由，除了撕裂为二，有什么用？
> 你从悲伤、喜悦中什么也没学到？
> 喔，德国，低或高，你不是个聪明孩子。

各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一个“奴隶条约”，是它创造了希特勒。散布这种认知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德国宣传手段。事实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对战败的德国而言是一个最愉快的惊喜；说它与希特勒兴起有关，实在太过牵强。《凡尔赛和约》的三个主要条件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取消，如果碰巧不是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的威尔逊总统[注]领导美国政府，如果代表美国出席谈判《凡尔赛和约》的是别人，那么德国肯定无法继续保留莱茵河地区，而且和平条约的内容也会依据克列孟梭[注]的提议而定——但这或许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德国假装他们是因为威尔逊的十四点提议才在1918年要求停战。但实际上，经过四年战争，德国人已经被打败，不得不要求停战。终战不是因为国内人民发起革命所导致，而是德国将军在德国水兵袭击基尔（Kiel）的前一个月炮制了一场革命。鲁登道夫将军[注]得到兴登堡元帅的支持，如同赌徒般地宣称：“我的游戏完了，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必须在24小时内停战。”

大家可能有兴趣知道，德国的勇气崩溃得太突然、太彻底，以至于德国人在部队仍深入敌军领土之际就已弃战。德国当时与其盟友所拥有的领土其实与今日差不多，但德国最高指挥部在24小时之内便完全瓦解，甚至在询问停战条件为何之前，连尝试将部分军队撤回德国的企图都没有。德国的将军们没有回到德国本土的勇气。

《凡尔赛和约》确实应为一些种族错误负责。没有确定德国的赔偿金额也是一个错误。在美国人的建议下，条约里规定了公民投票这个全新的东西。然而，德国是唯一一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的国家。他们支付了4.4亿美元的赔偿金，同时居然还获得6.4亿美元的贷款，到目前为止却连一分钱都未偿还。

“波兰走廊”问题并未引起德国人注意。我出生的地方接近波兰边境，所以

深知德国人对这块帝国边陲有多么不重视；它几乎是未知之地。但是，德国的报复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宣称《凡尔赛和约》设计出波兰走廊，将德国划分成两个部分。然而这条走廊就像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一样无害，而英属哥伦比亚省还比波兰走廊大上百倍，将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分开。但波兰走廊对容克来说是个阻碍，容克们在这里握有大量田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

《凡尔赛和约》真正且根本的错误是对德国心理的完全误判。协约国认为德国无须教育，更无须传统，便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尽管协约国拿走了几块领土，但他们留给德国人的是完全且无限制的自由。

后来协约国藉由每五年修改一次的办法放宽了条约规定。即使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白里安(注)也无法理解德国人的心态。当白里安同意将莱茵兰地区比和约规定的时间提早五年归还给德国时，一名所谓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对我说："你看法国人，他们不过是懦夫。"德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订立"君子协定"。

协约国在1919年误判德国人的个性并不奇怪。许多声称熟知德国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这些借着写书来影响民意的人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认为另外一个德国、那个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德国，将会上台执政。德国共和国的悲剧应该是德国人并没有争取，而是被动地接受了共和。恐惧在第一时间占了绝对优势，随后一些没有经验的自由主义者被容克的怯懦推上台面，接管国家之舵。他们没有领导力、毫不积极，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人大声下命令。德国人只能自怜。当希特勒宣称德国人不适合民主时，他说得相当正确。他们怎么可能适合呢？三百多年来，他们一直被耳提面命地教导一定要听从军事领导的话。



艾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德国政治家及政论家。1919年至1920年曾任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后遭暗杀。

Mord Erzberger

Als Täter sind ermittelt:

1. Der am 20. Juli 1893 in Saalfeld (Saale) geborene, seit Ende April 1921 in München, zuletzt Maximilianstraße 33, wohnhaft gewesene

Kaufmann Heinrich Schulz;

2. der am 27. November 1894 in Köln-Lindenthal geborene, seit Mai 1921 in München, Maximilianstraße 33, wohnhaft gewesene

stud. jur. Heinrich Tillessen.

Schulz ist der Täter, dessen **linkes Ohr** am oberen Rand verstümmelt ist. Die nachstehenden Brustbilder stellen Tillessen dar.







Offenburg, 12. September 1921.

Badische Staatsanwaltschaft.

艾兹伯格和其他两人遭到暗杀的消息公告。

魏玛共和国建立在自由和人道的法则上，但德国人觉得其极度无聊乏味；他们从来没有担当过责任，因此害怕共和。新拥有的自由让他们备感困扰。他们不明白人人平等的含义。他们不喜欢，甚至抵制魏玛宪法。德国头一件政治谋杀案就发生在“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也就是纳粹党上台前十年。伟大的拉特瑙和另一名共和国部长艾兹伯格以及其他三人在共和国初期的1920年和1922年间分别遭到谋杀。这些谋杀象征着广大群众对共和国的厌恶，而且社会大众普遍同情凶手。受过良好教育之人、教授，乃至所有大学，都加入了赞美仇恨和复仇之列。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者变成最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种现象几乎在各个国家都会出现：只要战争失利，反对派就会变成民族主义者。

由于新的共和国在德国如此不受欢迎、虚弱，而且无力治理，以至于共和国成立十年后，每逢开会或游行，便不得不将国旗用帆布遮盖，以免受到人群侮辱。“共和国”一词在德国受到极度厌恶，所以德国人改以“帝国”一词取代，因此，德国目前仍然是“帝国”。

“一战”中，除了开战的前几周敌人曾打到帝国遥远的角落之外，敌军并没有开进德国境内，德国人因此有了德国从未被打败的认知。他们说：“我们没有输掉战争！”“我们是从内部被出卖了。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在我们背上捅了一刀。”

有关“不败军团”题材的书籍动辄销售数万本，成为德国国内的畅销书；自由派作家的书不得不到国外寻找出路。胆小的共和国领导人没有增加共和国的威信，其中一些人更是彻头彻尾的叛徒。两名需对德军崩溃负责的将军出现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他们不但从国会领导人的手中收下鲜花，还听到领导人说出表达民心的话：“我们爱你。”这一幕真是滑稽。

劳工领袖没有反抗，也没将容克和伯爵们送进监狱，反而与比自己更激进的兄弟争斗。他们过去曾经与工人国际[注]并肩合作，如今却转而反对。

根据兴登堡的副官格罗纳（Wilhelm Groener）将军所言，在“革命”的第二天，劳工领袖艾伯特与兴登堡元帅联合镇压了所有的革命行动。1918年11月的真空期仅仅历时十小时：获胜的劳工党立即向战败将军投降了。

有太多旧军官，特别是那些属于贵族阶级的军官，在共和国时期仍留在原本的岗位上。因此，新上任的自由主义领导人当然只有名义上的控制权。

在德国唯一仍能激起爱国热情的是国家防卫军（Reichswehr，简称国防军）。国防军当然一如既往，仍由旧时的容克领军。《凡尔赛和约》允许德国拥有的十万军队，后来变成一百万，他们并不正式隶属国防军，也不称为军队，但他们就在那里。有别于法国王室后代在一个世纪内不得回到

祖国的禁令，德国皇太子逃到荷兰后没多久就获允回到德国，这是因为共和国如此虚弱，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胆敢拒绝一名王子。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首任

总统。

接着，德国举办了第一次选举。那么，很聪明的德国人做了什么？德国人千年来首次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但他们选了谁？当时有六七名地位崇高、经验丰富，又深具领导气质的人可选，德国人竟然选择了年近80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他唯一的竞选资格是在德国投降前拒绝和平谈判——就像他的一个祖先曾在1806年投降，将某座普鲁士要塞交给敌人，因而被判处死刑（这是兴登堡家族最值得夸耀的事迹）。不过，美国人说："兴登堡是德国的骄傲。我们相信他是领导德国政府的最佳人选。"然而，他们昨天还拿同样的话来形容贝当[注]。

当老元帅担任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总统时，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他可真是大出风头，获得了德国人的支持。他们高喊："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新国王。"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满脸大胡子，裤子上还有一条很宽的红色条纹。

这个由德国人选为德国首任总统的老人立即宣布威廉二世有权获得数百万元的补偿。他也捏造出可怕的谎言，说这场战争不是败在他手上，而是因为他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社会主义者非常想要复仇，因此，为了建立军事力量，尽管社会主义者在"一战"前的50年间都反对海军扩张，身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理还是签署了建造新战舰的法案。他们非常高兴能与真正的伯爵一起工作。

魏玛共和国不是败在凡尔赛宫，而是败在柏林；不是因为独裁者的暴力事件而输，反而是输在德国民族的灵魂没有学到民主的真正含义。这样的情况构成了一个投机分子可在当中运作游走的理想空间。

民主的暴君

德国的宣传工具成功地让美国人相信《凡尔赛和约》毁了德国的经济。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近几年来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从1923年至1928年的制造业，尤其是钢铁生产，增幅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德国几乎所有工厂都照常运作，处处可见产品生产及使用奢侈品，而且德国的书籍销售荣景依旧。

通货膨胀是一些德国工业家发明出来的欺诈伎俩，以便得到来自柏林国库数以百万计的贷款，这些人随后将之兑换成外币，几个月后，再以贬值的银行票据形式转回德国。德国工业最大的黑帮老大雨果·施廷内斯（Hugo Stinnes）就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笔的财富。即使是在他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用“捐赠”数百万元给妻子的手法，逃避国家的继承税。

德国经济直到1929年仍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另外则是德国拒绝支付战争赔款。德国单单从瑞士就得到20亿美元的贷款，但他们根本没有还钱。在这些国外贷款的帮助下，德国首先破坏条约，资助希特勒，接着又从当前战争的军备中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财富。现在他们竟然打算对同盟国采用绥靖政策！

有些在美国的人说，失业率造成了希特勒的崛起。难道美国没有同样的失业问题？从1925年到1928年，德国人就像美国人一样享有繁荣。

美国和德国同样从1929年到1933年有失业问题。美国有1 000万人失业；德国则是500万人。如果失业率是希特勒上台的原因，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像德国一样变成法西斯国家？

因为“军装”在美国只代表一种特殊身份，但数世纪以来，军装在德国却是伟大的理想。当最后来了个希特勒，恢复铜管军乐、制服、勋章、踢正步，让他们有一个成天大声下令的老板，这对德国人来说是多么幸福的日子！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个人甚至将马靴还给他们，即便他们根本无马可骑。当有人问一名银行职员，为什么他和其他职员都在办公室里穿着马靴，他回答说：“我的元首今天在纽伦堡。”这是德国人的心态，要改变并不容易。

希特勒给了德国人一个主宰世界的新愿景，他篡改了一个从中古世纪以来就在德国地区流行的神秘口号，这口号很容易在德国人的心中得到回响。



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德国贵族、军官和政治家。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他是纽伦堡大审中的24名被告之一，但根据其起诉书，最后法庭以其不足以“密谋触犯反和平之罪行”获释。

德国人理解抱有如此理念的统治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大炮是由95%的钢、铜、镍，以及5%的哲学思想制成。他们倾听主宰世界的音乐——瓦格纳的作品。1933年5月1日，希特勒在滕珀尔霍夫注对着十万人呼喊，要求众人“服从”。他三次大呼“服从”，全世界都听到欢迎他的如雷掌声。从这一刻起，德国人用欢呼声迎接他，德国开始热爱他们的元首。社会主义者未能赢得共和国，他们的领导者为人虽诚实，但无足轻重。德国社会党注当中找不到任何有能力的政治家。

当凯撒和王子们逃离德国时，有两名帝国军官为了保护帝国旗帜战死，他们的名字是科宁（Köning）和齐默尔（Zimmer）。然而，当冯·巴本在1932年解散普鲁士政府时，却不见任何一个德国工人为共和国效命而死。德国人再次证明他们热爱服从权威更甚过自由。德国人愿意为祖国战死，但不喜欢为祖国思考。要他服从别人很容易，但他几乎不可能坚持个人权利，或是主动采取行动。如果有一个人想要通过类似美国总统那种公开演讲的方式来呼吁公众，这在德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德国人不喜欢说服力，他们喜欢大声喊叫的人。听到这种人的声音，他们会说：“这必定是一个强者。”我小时候曾见过极为聪明的人，甚至是自由派的科学家在听到凯撒说话时那激动的神情。凯撒的说话声就像士官长大喊，令人不快。

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在道德上及法理上的真正代表，他是以最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入主白宫的方式并不比希特勒在1933年进驻柏林帝国总理府更合法。德国在1932年的最后两次自由选举中，仍然采用无记名投票，德国人民以自由意志投票选出了最强大的纳粹党。希特勒被选为这个最强党的领袖，就像英国的乔治国王提名丘吉尔领导英国内阁一样，德国的兴登堡总统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是人民的选择。过去没有候选人曾经这么公开地宣告过政见，所有德国人都非常熟悉希特勒的方法和目标——《我的奋斗》描述了这位“元首”对主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害犹太人以及两类公民差别的看法。除了少数几百万人外，德意志国家很高兴他们找到了新的上司。

这里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提名就是决定性的一步，也绝对合法。希特勒是在上任后才开始着手破坏宪法和侵犯现有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

希特勒是唯一利用政府、用最民主的方式得到权力的现代暴君，所有其他现代独裁者都是用武力攫取权力：拿破仑一世于1799年、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墨索里尼于1922年，这些独裁者都是以武力或威胁击败他们的对手。法国和意大利的人民是被蹂躏的受害者，因此无须承担责任，唯独德国人亲手选出了他们的独裁者，因此，德国人需要负责。他们不仅选出了一个独裁者，还让他执政长达十年。

在1933年那段日子里，歌德口中的德国在哪里呢？我们的书籍在5月时被公开焚毁。围在营火周围的不只党卫队成员（Schutzstaffel，简称SS），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兴高采烈地大喊着，并把书本扔进熊熊火堆。这些大学生不久前还曾急切地读着这些书，如今却在焚书。

当然，即使在德国，还是有些例外，比如尼莫勒尔牧师。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他被捕前也曾对一名美国人说："如果有一场对法国的战争，我会马上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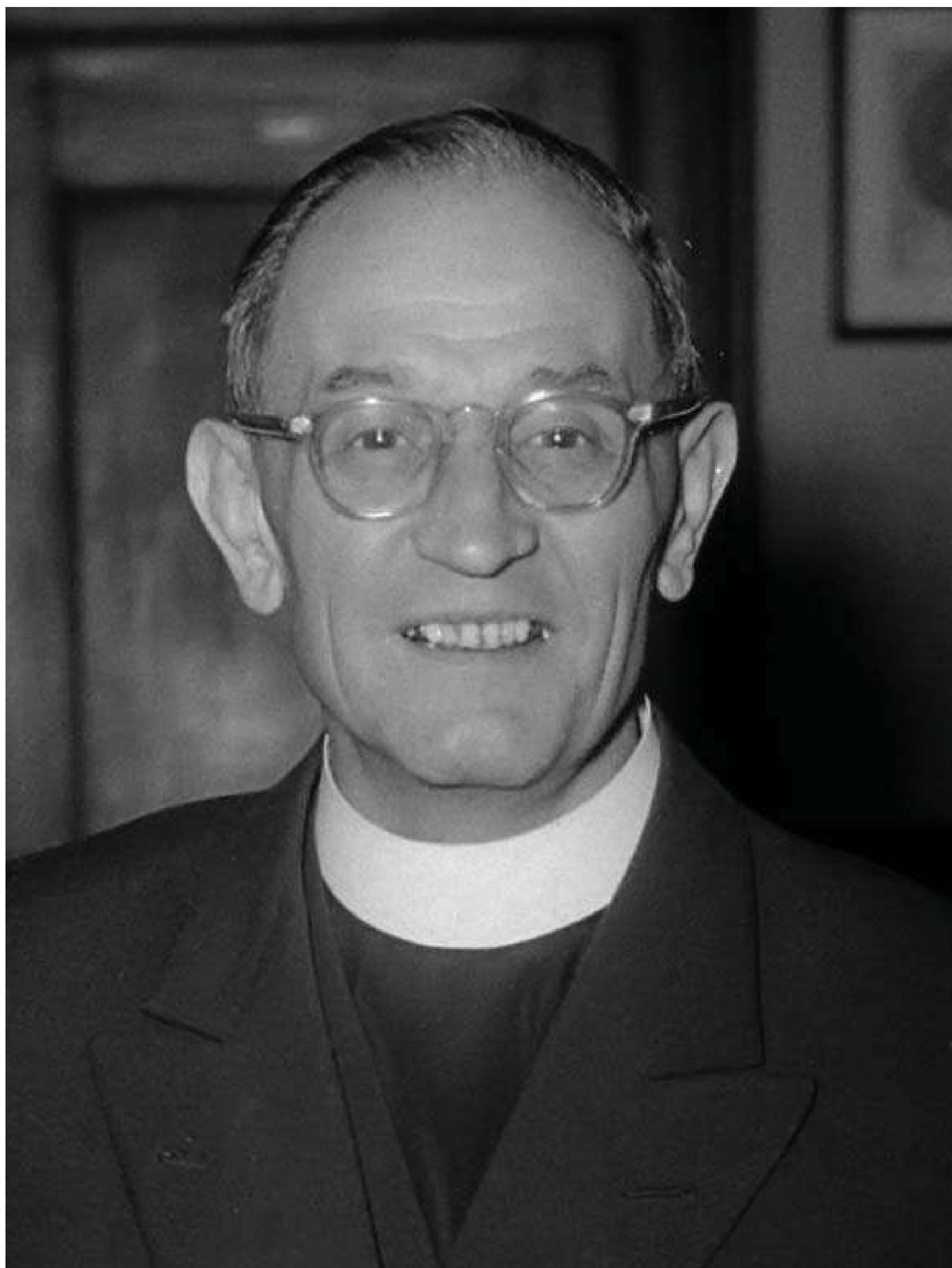
纳粹的野蛮行为并没有得到所有德国人的赞同，有数百万人反对这种肆意破坏的行动。但他们保持沉默，默不出声。是谁真正起来反对希特勒？是几个牧师和工人。犹太人不仅被纳粹攻击，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甚至还对此鼓掌叫好。我将会公布数以百计的目击报告，描述德国公民，不论男女，没有受人催促或遵循官方命令，但凭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帮助党卫队追捕、鞭打和杀害犹太人。有一小群德国人无动于衷，但也有些人会帮助受害者。档案资料证实了从1933年至1938年，所有德国和奥地利地区都曾发生过大屠杀。



柏林焚书事件现场（Bücherverbrennung 1933 in Deutschland），1933年5月10日晚上，柏林歌剧院广场前聚集了大约七万名学生，他们用卡车和推车运来将近二万本书。大学生几星期前已开始从图书馆中将内容带有"非德国"思想，或作者是纳粹德国的敌人的书籍取出，许多图书馆员，甚至教授都默许此举。当晚，学生代表古特亚尔（Herbert Gutjahr）在现场对人群大喊："我们已经起身反对非德国的思想。我把一切非德国的全

扔入烈火。”被焚烧的万本书霎时已成火海，而且焚书行为不只出现在柏林。
图片来源：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D





尼莫勒尔牧师（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激烈的反纳粹者，后遭逮捕入狱，人称“希特勒的私人囚犯”。

德国人可以轻易证明他们无需为威廉二世负责。确实如此，他们“继承

了”这个人。后来共和国失败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但是，对于希特勒，德国人没有借口说自己无需为自己所选出的人负责。

战败的德国人

拥有同情弱者传统的美国古老清教精神，现在试着要原谅德国。美国人总认为发生在德国的暴行是由纳粹犯下的，不应该归罪给德国百姓。

德国大约有100万名纳粹士兵，但德国军队有1 500万人。大家都看过这些德国官兵的照片或影片，关于他们暴行的报告则有成千上万篇。谁是那些驾机俯冲轰炸法国、用机关枪扫射逃难的波兰妇女的飞行员？是谁用鱼雷炸沉医疗船？是谁明知那300名小孩是目标，却还轰炸英格兰小镇巴斯（Bath）？是谁摧毁了捷克的利迪策村(注)呢？是谁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和扫射无数的犹太人呢？

《柏林画报》(注)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有8名波兰犹太人拉着一辆马车。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大笑的德国士兵站在车内，他们乐在其中地讪笑这支奇怪的拉车队伍。这些无名士兵都是德国人，他们不是纳粹，所有暴行都是普通的德国士兵干下的。这些普通士兵就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典型，就像一名普通美国士兵代表了美国的典型。

然而，要注意的是，激起这些德国人热情的并不是病态。一个人可能是“虐待狂”，就像希特勒或刽子手海德里希，但没有一个国家是虐待狂。

这些人是被病态的理想主义所感动：崇拜暴力的信仰。他们受到德国作家的影响得到这种信仰，甚至早在黑格尔之前的数百年就已开始。纳粹检察总长表达他对这种信条的看法：“有益德国的事就是对的。”我们都知道其他国家在战争中也有残酷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崇拜暴行的信仰。“对或错，我祖国”是一个以防卫为主的口号，而不是侵略世界的借口。英国从来没有宣称：“我们是世界的主宰，对我们有利的事情就是对的。”



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1942），德国纳粹党党卫队重要

成员，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由于行事残酷冷血，因而有“金发禽兽”“铁石心肠”“纳粹斩首官”等称号。

法国的克列孟梭说“德国人热爱死亡”。他们确实热爱悲剧，这就是德国人和美国人的主要区别。

德国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既然德国人以一国的身份负责，就该以一国的身份受惩。

今天的美国（而不是英国），有可能陷入德国所设的陷阱。威尔逊在1918年试图区隔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凯撒时，就曾掉进过这种陷阱。威尔逊说，凯撒和其领导阶级命令德国人打仗，所以应由他们负责，而不是人民。

如今，旧事重演，这个在一个世代两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有可能免除引发战争的责任，只因为大家对他们有过度的同情。

任何同情当今德国的人都应该成为甘地主义的追随者。但是，拿起武器、牺牲年轻人生命以对抗德国这个战士民族的人，万万不该在严厉地防堵德国第三次侵略之前松动、心软。如果你逮捕了一个无赖，你并不是野蛮人，但如果你拥抱这个无赖，当他是兄弟，那么你绝对愚蠢至极。

只要双方坚持，“公平竞争”的规则便是可靠的。当德国领导人打破1919年的条约，当德国人践踏了每个战争规则和人性法则，德意志民族对欺骗的信仰就显现出来了。整个德国鼓吹、实践百年的暴力信仰必须受到惩罚。这必须由决心坚定的人完成，他们为此奋战对抗德国，他们会要求对手为其行为和信念负责。

你们当中若有人想要实践基督徒的慈善宽容，难道不是应该先关心被征服的两亿欧洲人民，而不是加害他们的刽子手吗？

希特勒将可能被他自己的人暗杀——可能是容克，不过他们会说是犹太人下的手。当征服者不再赢得伟大胜利时，大众就会抛弃他。拿破仑曾说：“一个合法的国王可以一再战败。但我是一个征服者，我连一次都不能失败。”

当他果真失败一次时，他也就失去了一切。

世人不太可能看到身穿囚服的希特勒坐在被告席上受审：不是因为他会自杀或被敌人杀死，而是他绝望的追随者会将他处死。

在英、法等国家，臣民曾经审判、处决他们的国王。但德国法院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去谴责一个战败的统治者。

如果希特勒活着留在德国，并且在德国法院接受审判，德国人会谋杀那名胆敢控告希特勒的法官。他们会用鲜花欢迎被告，就像他们在1919年12月兴登堡前往国会听证会作证当天那样；或者，他们会像对待逃跑的凯撒一样，将数以百万计的现金还给他，并且在凯撒生日时，前往他在荷兰的豪宅献上大量鲜花。德国人会为希特勒提供养老金，和一栋坐落在柏林绿森林区[注]的别墅。一年后，他们会到他家朝圣，并将他的照片挂在墙上膜拜。

德国人会先窃窃私语，渐渐地，会有宣传大字出现：“我们伟大的领袖——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刻，被苏联的共产党人出卖，被美国富豪出资的工厂里的法国囚犯出卖！”

几个世纪以来，即使权威有错，德国人还是会捍卫自己的权威；即使被击败，他们还是崇拜神圣的国家。德国人不喜欢指责统治者，因为领导者若是错的，他们的理念就会随之动摇。出于这个原因，革命在德国从来没有成功过，基于同样的原因，1919年战败的德国在思想上也没有出现变化，1944年亦然。德国人天生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德国根本性格，造成了他们无法承认自己的选择有错。

德国人的心理崩溃可能会与希特勒的死亡或逃亡同时发生。毕竟，他们在过去11年间战事不断，而不是像上次大战只有四年。现在会有战争疲乏的问题，而且，上次战争还有保卫王朝的动机，普鲁士王朝当时已存在400年，德国人因此能持续作战到1918年。

能迫使德国崩溃的最主要因素是空袭轰炸，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从上垂直发动的第二条战线。想找出德国和英国相似之处是大错特错，英国和德国的个性不同，英国人固执，他们在面对空袭轰炸时会挺直脖子、咬紧牙关，对自己说：“我不逃跑；即使十年，我也要在这里坚持下去。”他们高度发达的责任感更是增强了这种态度。

德国向来就不懂何谓公平竞争。比洛亲王的回忆录和凯斯勒伯爵[注]的著作就举了不少惊人的例子证实这一点。纪律和服从是德国人的特点，但德国人缺乏慷慨和公正对待敌手的性格。因此，每个德国人都认为要是他输了，对手不会公平对待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俾斯麦说：“德国人没有公民勇气。”俾斯麦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但是当他没有制服、没有长官、没有上校指挥时，伫立在空袭轰炸下的科隆（Köln）或埃森（Essen），俾斯麦的勇气也会轻易地丧失殆尽。

德国会提早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希特勒辞去最高军事指挥的职位。交出他的指挥权对德国人而言就等同于败仗，比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战役更糟

糕。十多年来，有7 000万人相信他们元首的魔力；如今仅仅五年后，只剩4 000万人相信。但是，直到希特勒军事退位之前，他都依然代表德国人的最后希望。如今，他的军队在每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失败就在眼前。在领导应当带头的最重要时刻，他放弃了指挥权！

德国人民到1943年秋天仍然团结一致，唯一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由，就是戈培尔一年多来不断灌输给德国人的感觉：他们将会被卖为奴，或是绝育灭种。为了打破这种宣传伎俩，应当将我建议的宣言郑重地传达给德国人民周知（宣言附在本书结尾）。宣言内应该包括盟军的真实意图，也就是：盟军会占据和管理德国，但不诉诸惩罚整个德国。

希特勒死亡或倒台的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容克和将军将会立即弯腰鞠躬，并说："我们喜欢美国人。我们不恨犹太人。我们不要求殖民地。来吧，让我们再次成为兄弟。"

希特勒退场后，容克会让步做出任何事情，甚至可能将烈士尼莫勒尔牧师交给盟军，以显示自己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尽管事实上是他们发起了战争，但他们将尽一切努力，避免被追究责任，一如他们的父兄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将如同1918年那样，再度派出一些德国自由派人士签署停战协议。同盟国里的一些团体会说："现在让我们来谈和，让我们完成这些事情。这些将军毕竟是好人。"

但他们不是好人。容克们并不比那些"希特勒们"好多少。的确，他们的礼仪较佳，但是他们和纳粹一样有罪。如果没有总参谋部，希特勒不可能走向战争。因为他恢复了容克们的军阀职位，给了他们权力和金钱，并且帮助他们实现复仇的梦想；容克们因为希特勒广受欢迎的"吸引力"，接受了这个他们鄙视的矮子、一个奥地利无产阶级之子。

这一次，必须由纳粹和容克签署停战协议。这些德国将军、这些战争意志的旗手必须遭到摧毁。只要他们存在，每个德国男孩都会梦想着报复。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的不只是所有的德国军队，平民也必须接受。这不仅仅是军人的精神，也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不反对一场耗时四年战争的国家的精神。

盟军战胜后，必须决定要如何处置这个国家。在美国，有人建议了两个不同的计划，但我不认为当中有哪个是可行之计。其中一个是将所有德国人遣送到上尼罗河地区，或对所有德国男性施行绝育手术、摧毁他们的工厂，并迫使他们在德国种植马铃薯。我很惊讶地听到一名自由派作家重复说着这种无稽之谈。盟军不会破坏德国的工厂，我们也不能灭绝7 000万人。我们无法将整个国家运送到海外，也不会让一个国家灭绝。我们不能奴役一个民族，即使是为了正义、惩罚他们发动战争的罪行也不可以。但

是，第二个建议说："把自由还给这些可怜、被误导的德国人。这能诱使他们创立一个更好的共和国。这些人是无辜的。"当然，每个人都同意纳粹领导者应当分别受到同盟国法庭处罚。应受惩处的领导者不只20人，而是数千人。如果我们相信只是服从指挥做事的人不必负责任的话，那么全德国几乎也只剩下一个罪魁祸首希特勒了。就连他也可以声称是全能的神下令要他履行命令。

在处理一个7 000万人口的国家时，我们应该记住，自从贝卡利亚[注]以来的200年，我们对刑法已经有了新的理解。我们惩罚，但不报复。我们为了社会安全才监禁罪犯，同时也重新教育罪犯，让他能够洗心革面，这一政策必须用于德意志民族。解除德国人的武装，而且必须比过去更为彻底，我们藉此可以确保社会的安全。裁军行动必须彻底，就连德国警察也不可在腰间配枪。

战争结束后马上建立起新的国会或帝国国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没有哪个自由派人士的权威能够领导这样一个机构。尽管流亡的德国移民心系祖国，但让他们返国创立一个自由德国同样不可行。这种做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成功，怎么会有人认为德国人在这次战争之后，能在一夕之间成为民主人士呢？有没有一种民主血清，让人注射后能对军国主义、对主宰世界的渴望，或对穿制服的长官的服从欲产生免疫力？可惜，这种血清尚未发明！

有些流亡的德国移民很真诚，但是也有人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作为成立新自由德国的保证。其中有些人在上次战争中写了些非常军国主义思想的书，或是在和解的伪装下准备对法国"复仇"。有些人只想讨回自己的老房子和旧工作，另外也有人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曾在共和政府任职，但他们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兴起。

现在他们说，这不过是一个在偶然机会下来到德国的投机分子，利用了整体失业率令计谋得逞，并且推翻了和平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前任劳工部长胆敢公开宣称普通的德国小伙子比美国年轻人优秀，就在他说话的非常时刻，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正因为德国人心存报复而战死沙场。此人做此宣称时正作客美国，当时一份在纽约发行的德国周刊，其主编为了迎接德国战俘来到这个国家，还写了一篇热切的欢迎社论。其他的劳工领袖在他们的正式会议里仿佛大权在握，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死气沉沉。

有别于俄国或意大利，德国没有人对移民怀有同情心。没有一个移民能在德国获得政党或道德权威。

当今最盛行、同时也最为愚蠢的一项建议是："告诉德国人，我们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能摆脱目前的领导人，他们就能获得独立与自由。让他们自

己起来革命，然后欢迎我们这些救星，让我们皆大欢喜，有个快乐的结局！”

威尔逊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结果如何？他建议德国人送走凯撒，得到自由。凯撒出逃，将军推卸责任，让一群自由主义者担负签署投降协议的耻辱。但不到十年，仅仅十个月后，大败的军国主义派系就已强大到足以谋杀新共和国的领导人。每个德国人都在建立更强大的国家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荣誉，新执政的劳工阶级只有一个野心，就是要证明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地“爱国”。共和国不是在1933年，而是早在1919年就已遭到抵制，德国人此时对一场新的战争已开始有了心理准备。一场从外部下令或建议的革命，就如同一个女人被朋友说服而离婚；如果她决定离婚不是出于内在力量，那就说明她还爱着她的强人丈夫。同样地，德国人现在还爱着自己强大的领导者，即使这个领导者背叛了他们。

审判德国人

我可以看到德国未来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德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是有可能的。崇拜希特勒的青年可以轻易地将纳粹标志（Swastika）改成镰刀和锤子，对这些青年而言，这些符号背后的理念并不重要，他想要的就只是一套制服和有人发号施令而已。虽然希特勒的信条完全无法与共产主义的内容相提并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替德国接受共产主义做好了准备。此外，德国重视命令更甚于金钱，重视秩序更甚于自由，这些全都让共产主义有机会接管德国，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容易许多。

苏联想让德国既强大又施行共产主义的想法，似乎与西方国家想让德国既虚弱又不自由的观念格格不入，但苏联唯有发动战争，打败他们的西方盟友，才有办法实现这个想法。但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都已精疲力尽，而且德国亦然。战胜国之间的协议在体制上有其必要，苏联和西方军队共同占领德国是在延续双方在战时的合作。尽管莫斯科还没有达成有关德国的协议，但未来不会出现对抗苏联的战争。因此，在德国的占领军将会是混合组成。

盟军应设立托管委员会，当中包括所有联合国代表，但不邀请与德国接壤的小国代表加入，以免他们可能故意寻求报复；这可能会造成错误，而且也会让德国正好有借口证明他们对国家优劣的想法。

强而有力的联合国占领军应当接管德国所有重要的地方，如此一来，可让德国人在130年来首次有机会见到外国权威的样子。只有透过外国脸孔、外国制服、外国语言、外国习俗，德国人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击败；他们在1918年断然否认战败，主要原因就是战胜者没有踏进柏林。没有人

会未经审判就遭到监禁或处死，但德国人必须感受到他们所鄙视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地位不仅与他们平起平坐，而且更是胜利者。

盟国政府必须惩罚所有的德国战犯，不论战犯的身份是军人或平民。法学家将必须决定哪些罪行实属个人所为，哪些则是集体犯罪。

有人建议将战犯交由德国法官审判，但这是不可接受的。德国人当初曾在1919年签署一份协议，同意交出900名战犯，这些人可称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党员”。后来，德国教授严正抗议，反对这项协定，声称旧帝国政府理当受到保护，这些教授此举的精神与他们支持入侵比利时的精神并无不同。

1920年的协约国处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主义的压力下，体质太弱，只好放弃《凡尔赛和约》里不同的权利，例如，将战犯的审判移交给在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如今，清教主义的压力又再度回魂。当时的协约国相信法官的忠实公正性，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最高法院拒绝起诉名单上的888人；他们开庭审判了12个人，有6人被判刑，其中3人几天后越狱逃走，无人被追捕到案。900人名单上的最后3个战犯只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星期。如果将纳粹领导人交由他的德国同胞来审判，明天全世界还会有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德国必须使用德国劳工、资金和建材，重建所有他在别国破坏的房屋建筑。所有遭德国人偷盗并运至德国的别国物品都应归还，德国从国内纳粹受害者夺来的财产也要物归原主。此举可给德国人一个教训：战争绝非一门好生意。

整个欧洲受到轴心国和同盟国炮火轰炸，损失已无可挽回，未来在德国濒临崩溃的过程中还会造成更多的破坏与损失。同样的事情在1918年时也曾出现在兴登堡撤退法国之际，德军当时在根本没有任何战略需要下恶意破坏。1939年至1943年间，德国破坏了教堂、绘画、雕塑及无价的图书馆。这种破坏人类至高成就的罪行必须受到严惩，德国至少要归还所有还握在手上、在战前或战时从各国掠夺而来的艺术品。在德国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纪念碑之后，全世界怎么可能允许德国继续保留任何一件荷兰、法国或其他国家的艺术瑰宝！

盟军占领政府里的部分工作可交由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和一些忠实的海外德国移民共同担任。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出现另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组的国会，这样的国会曾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不该再信赖那些在强盗洗劫房子时还安静躺着睡觉的人。

主宰世界的冲动

此处正显示出德国和意大利心态之间的差异——意大利人可以回顾他们的民主传统，2 000年来，共和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蓬勃发展，意大利人在19世纪为了自由战斗了40年。意大利从加里波第[注]、马志尼[注]、加富尔[注]等人的革命精神中获得自由，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却还是犹豫不决的理想主义者，直到俾斯麦这个容克才统一各地，建立起德意志帝国。墨索里尼打破了意大利民主的百年传统，希特勒则终结了14年的民主间奏曲。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暴政没有现代典范，他不得不从罗马帝国寻找他的偶像；而希特勒不过是延续普鲁士军事独裁统治的300年历史传统。因此，意大利的各党派、各阶级仍记得他们过去的自由，明天过后可能又产生出一个民主领袖，但德国人没有革命烈士的名字可供回忆，也没有一个自由时代可供恢复。魏玛共和国从未激进地保护自己，如今留下来的仅是耻辱。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能在战败后治理自己，但德国不能。

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是德国那股一心想主宰世界的神秘冲动的受害者。意大利的财富较少，人口密度与德国相同，但意大利人并没有欲望去征服法国、瑞士、塞尔维亚或是希腊。征服与主宰的欲望深藏在德国人好战的灵魂深处，不论是在今日的德国人或过去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注]心中皆然。意大利发动战争是为了扩展他们的贸易和自由，但德国人是为了征服；意大利在忍受他们的独裁者，德国人却热爱自己的暴君。

法西斯主义在爱好和平的意大利人手中，17年来从未威胁世界，但当这颗种子在爱好战争的德国人心中落地生根，法西斯主义却成了一股威胁。

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的意大利人不会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但是复仇的情绪却会在1945年的德国人心中狂搅，一如1920年那样。

有人建议应当将德意志帝国分割成二三十块，恢复到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的政治板块。但这样的解决方式有悖于这个时代的潮流。19世纪见证了部族合并为国家；尽管我们看到德国、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国家的解放当中都有错误，但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国家确实还算合乎逻辑。

把德国一分为二

但还是有些可以处置德国的方法。德国的破坏性元素来自普鲁士，所有文化和建设性的元素则来自德国的南部和西部。因此，德国可以一分为二，而不是切分成30块。切断整个东北部，加上普鲁士境内的容克领土，可以

创造一个大约有2 500万居民的普鲁士共和国。如此一来，普鲁士总参谋部再也不可能动员，也无法利用一份公告就发动整个德国。这种划分法也能打破容克的经济力量。这些容克在留给他们的小农场上，将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农夫之子，或是在农场当起大领主，然后一边在柏林挥霍金钱，一边在精英警卫团担任军官，并在夏季寻找新的抵押贷款。德国需要最彻底地清洗并授之以全新方向的两个群体便是容克和教授。

普鲁士的分离不该由胜利者的命令来完成，而是应由自由的德国公民投票决定。因此，隔离普鲁士这个预期的结果应该由人民解决，这肯定将废除当年俾斯麦的德国问题解决方案，产生一个没有普鲁士的德国。

排除普鲁士以后，其余地区可以组成一个约有5 000万人的联邦共和国。

邻边各省可以公投决定自己要加入哪个德国共和国：普鲁士或联邦。这些省份更可能投票支持联邦共和国，普鲁士在德国一向不受欢迎，莱茵兰人就曾自称是“被迫的普鲁士人”（Muss-Preussen）。

这个计划有两个好处。首先，容克在政治上将从全国分离出去，他们的庄园会被分割并配给农民；其次，普鲁士总参谋部将无法颁布战争动员令征召全德国1 500万男丁。

奥地利及其600万德语居民可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现今对纳粹德国的仇恨可能会是一个负面因素。然而，尽管希特勒的执行手段极其残酷，这也可能是一件正面的事。我们可以接受敌人的目标，但用其他方法达成。奥地利1 000多年来曾属于帝国的一部分，但俾斯麦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主要的原因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也统治了7个非德意志的民族。几乎每一个奥地利党派在1918年都有“合并”计划，但因凡尔赛和会的胜利者反对而延迟。奥地利的决定将取决于他们在新联盟里能找到何种安全保证，政府唯一应避免的，是让哈布斯堡家族重新登基。当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在为祖国奋战的同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王子们除了两个例外，全都待在他们的城堡里，或忙着迎娶富家女。

一个新的国际联盟是很有可能在明天成立起来的，因为苏联和美国如今都准备加入。德国不能成为联盟成员。除了东普鲁士之外，德国在1933年时所持有的土地不应该被剥夺。德国应该偿还积欠欧洲的债务，但不是拿各省份土地来还，而是由个人偿付。除了烈士和积极的反纳粹人士以外，所有成年德国人都该投入重建工作，直到德国将所有破坏的事物全数修复完毕为止。

德国应该受允以国家的身份运作，但不准拥有武器；德国人的教育必须受到监督，他们也必须接受政治监护。如果不这样做，如果还有人继续

说“可怜被误导的德意志民族”，那么，20年以后，民主国家必得第三次和德国作战。

---

1. 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
2. 克列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曾二度担任法国总理，人称“法兰西之虎”。
3.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将军，1916年至1918年10月担任德军的军需将军。
4. 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一。
5. 又称“第二国际”，全名是“社会主义国际”，1889年在巴黎召开，以工人运动为主。组织在1916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
6. 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和政治家，也是维希政府的元首。
7. 滕珀尔霍夫（Tempelhof），柏林市的一个区。
8. 德国社会党（Deutschsozialistische Partei），成立于1889年。
9. 利迪策村（Lidice），1942年党卫队下令屠村残杀妇孺，战后估计约有1 300人受害。
10. 《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1892年至1945年在柏林地区出版的画报周刊。
11. 绿森林区（Berliner Grunewald），位于柏林的东区，以森林绿地、公园和大型别墅著称。
12. 凯斯勒伯爵（Harry Clément Ulrich Kessler，1868—1937），英德贵族、外交官和作家。
13. 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法学家。其作品《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深刻批评刑求、酷刑与死刑，成为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之作。
14.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将军和政治家。
15.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家。

16. 加富尔（Camillo Benso，Conte di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及第一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17. 哥特人（Goths）和汪达尔人（Vandals）皆为早期日耳曼东部的部族。

如何对待德国人

所以，你必须限制自己。
“必须”是很难的，
但这是男子汉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

德国的科学领先于世上部分国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丹纳[注]曾克服他身为法国人的骄傲，表示德国在1820年时，已经成为世界的思想领袖约50年了。康德彻底改变了世人的思维方式，贝多芬改变了音乐的使命，歌德被视为与达·芬奇或弗朗西斯·培根一样独一无二的人物。艺术和科学有许多是从德国传播到其他国家的，而后才在当地受到模仿和修改。尽管德国人一向不是伟大的殖民者，但他们的科学和艺术成就确实影响了全世界。

19世纪德国科学家发展出来的新思想成为这个世纪的基础。在20世纪，德国人把他们的理论知识应用在物理和化学的发现上。新发现的定律和理论变成了镜头、相机、血清、X光片。世界各地的专家来到德国学习，而后带着新学得的知识和对德国智识的敬重返国，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理论实际应用在非常重要的地方——特别敬佩德国在化工和造船两个领域上的成就。当“一战”战败几年后德国的“布莱梅号”[注]在纽约港停靠时，这艘船被视为是德国精湛工艺和企业的象征。

然而，德国人对他人的嫉妒心盖过了这种创造的态度，他们的创造力被亟欲统治世界的顽强野心所超越。他们不试图用自己的显微镜和合成色素、音乐家和运动队伍来赢得天下，反而追随古老的军事荣耀美梦。当德国人再度开始建造战机、坦克、大炮时，他们的未来之路便已注定。

在这硝烟弹雨的几年间，德国人的成就之一便是让世上其他国家学到了德国技术，复制了他们的坦克和轰炸机，这些国家如今在各方面都超越了德国。

这个高度先进的民族如今正在接受新的教育。这是一项非常困难、问题重重的任务。历史曾显示战败的文明国家可成功地教育战胜者，被征服的希腊人和基督徒教育了战胜的罗马便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战胜者接触到土著和原始人时也会变成教育者，或是例如在南美洲，一个高度发达但过时的文明遇到战胜者的新发明和科学。但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德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国家之一，我们应以一个严格但善意的主人身份，将德国视为

一个危险的少年天才，必须好好关注和管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新局面。要如何才能解决？

赢得尊重，而非同情

德国人正好让全世界知道何谓不可为。的确，德国征服了法国这个西方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以及荷兰、挪威等大国，但他们成功地征服了这些地方的人吗？完全没有。因为法国、荷兰及挪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他们知道这次的征服、这场灾难不会持续太久。他们鄙视战胜者，认为这次战败遭到占领不过是一场很快就能醒来的噩梦，这让他们有了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起身抵抗并拒绝顺从的力量。

当盟军这次进入柏林时，会让德国人完全无法否认德国战败的事实，此举会造成德国人在心理上根本的动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在此之后，战胜国既不抢夺，也不镇压，但是会守护、引导和教育他们。德国人个性服从温顺、不喜革命，而且不像法国那般无政府，所以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起来反抗占领他们土地的外人。

但占领和战后关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占领军一开始的态度。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态度会让盟军很难管理德国，尤其是美国人。美国人习惯照顾、尊重败者，试图让手下败将忘记自己的失败。德国士兵在1914年时拒绝与英国囚犯握手就是德国人会有不同想法的警示。

《凡尔赛和约》签署后不久，自由派作家试图藉由承认前德国政府的战争罪行，好让国人理解并达成和平协议。但我们立即被自己的同胞攻击，有些人甚至在德国遭到杀害，而怀抱相同意图前来德国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受到公然的不信任和暗中的蔑视。德国人说，“这些人一定是间谍”，因为他们不相信公平竞争，所以无法想象战胜者除了指挥官之外还能扮演何种角色。

德国对于在非洲的英国人的唯一钦佩之处，是他们对黑人持保留态度。而法国晋升有色人种担任官员，就引起德国人的厌恶和反对。德国人对于国家组织的看法就是像金字塔层级一样，每块石头上面都还有另一块石头，重量则由下面的石头承担着。德国人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主动放弃金字塔较高的位置。

几天前，一名在1919年曾是莱茵河占领军的美国人告诉我：“我搭上科隆的街车时，我和战友让座给两名老太太，车上乘客都开始嘲笑：那些家伙是征服者吗？”

德国人会接受并视盟军为希特勒的接班人。只要赢得战争——在条顿人的时代以剑和箭，在我们的时代则用坦克和飞机——即使是侵略者，也会赢得德国人的钦佩。但胜者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一件事，那就是表现出诚挚及和解。

所有盟军军官不可挥舞着骑鞭在柏林街头闲逛，如同德国军官喜欢在巴黎所做的那样。但是，盟军军官最好尽量多穿着马靴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是希特勒赢得德国青年尊重的方法，马靴一向被视为主人的象征。

盟军军官肯定不会模仿纳粹的做法，但他们在德国时应该放下自己对待同僚的公平观念。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很快就会挫败；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够强硬，德国根深蒂固的欺诈很快就会让人感受到威力。对抗、冲突，甚至谋杀将会阻碍未来工作的成效。

外国教育者对付德国人的方式只有一种：当德国人的主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地对待下属和仆人，有礼但不失权威。在美国，没有“老板”会对着职员大吼；但在德国，每个老板都这样。在美国，工厂、银行、加油站，甚至国务院，大家都以正常、礼貌的声音下令；但在德国，到处都可听到操练场上的军事语调。法官、教师、官员在办公室都会拉高他们的声音，平民百姓喜欢这样，而且觉得应该就是要这样。

当1919年法国军官前往柏林时，可惜他们没有带上自己的军队；当时约有十几名军官试图以绅士般的态度与德国人见面，他们立刻受到蔑视。

美国银行家帕克·吉尔伯特(注)是少数德高望重、受德国人敬重的外国人，因为他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



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图右。德国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让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重要人物。施特雷泽曼以其主张和解和谈判的政策，与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于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图左即为白里安。

最重要的，是要获得德国人的敬重，而非同情。盟军不能因为服务了德国人或废除他们的债务，就指望他们会有感激之情。

当白里安对德国表示善意，同意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的请求，让法国军队提前撤出莱茵河地区后，兴登堡便随即上演一出凯旋进入“解放”省份的戏码，并同时发表一篇对法国充满隐约威胁的演讲。兴登堡并未向白里安道谢。任何对德国的让步都会被他认为是接管了被扣留已久的物品。

所有明了德国性格的人都会向进入柏林的战胜国军队提出忠告：不要一直微笑！胜利者是主人，不是朋友。主人不露笑脸，他只下命令。笑的人会失去德国人的尊敬。他必须下令以获得尊敬，因为有权威才能治理这个热爱命令和服从的国家。

一个带着笑脸的人在德国是没有拥护者的。不仅王公大臣如此，甚至当音乐家在表演结束后向观众鞠躬，或剧作家出现在舞台帷幕之前，都必须要一脸忧郁，如此方可获得观众的同情。

美国人可能更难理解这种态度，因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拍照都必须面带微笑，也不能对人承认“我感觉很糟糕”，或说觉得自己的事情差强人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热爱悲剧的德国人会服从他们的新主人，尤其是在他们看到他在街上板着脸默默开车，或态度严峻、不带表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必须要让盟军军官或文职行政人员知道，盟国不应该采用美国人的开放态度，或允许任何人随时都能和领导见上一面。如果一个德国人终于获允进入办公室，尤其是从来没有拜访过办公室的人，盟军代表千万不要握手，也不要递上香烟。德国上司从来不会有这样的礼节。

外国军官不应该表现亲切，而是要始终矜持、冷淡且意志坚决。

如果盟军军官使用“战胜者语言”，会得到尊重。在商店或餐厅，或希望得到一些个人资料时，可尝试说德语，但在工作时千万不要使用德语。千万不要和平常打交道的人太友好，如果你以平等的关系对待一名德国人，他走出办公室时会对在外等候的朋友说：“一个好欺负的家伙；我们跟他打交道可以占上风。”盟军应采用的方式，是要让三个月后没有德国人会说“他是个好欺负的家伙”。盟军应该高不可攀。

一位绅士访问了在美国的德军战俘营，他证实了一个事实，亲切对待德国战俘的美国军官，得到的尊敬会比那些表现出权威感的军官来得少。

还有一件可能会困扰美国人的重要事情，那就是官员必须在所有场合都身着制服。必须反复灌输、告诉德国人，其他国家也有军装和武器，这一点在德国哲学里意味着文明。公务员不可让人看到身穿便服，如果他的工作属于平民性质，只要曾经在部队待过，他就应该穿着制服。

美国人不喜欢这些，用顶头上司的态度对待失败者有违他们的性情。然而，这是唯一能让德国人知道他们已经被打败、已经输了这场战争的方法。

德国人上回曾完全否认自己战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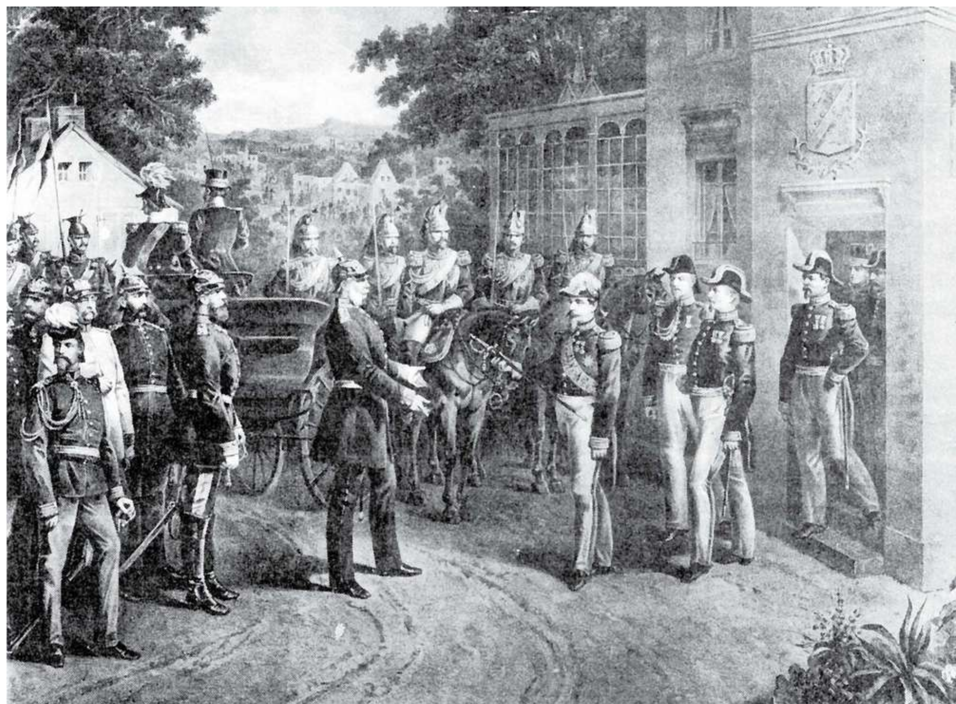
德国人必须看到外国军官和士兵出现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场合。他们的制服——德国人认为的伟大象征——应在所有公司、戏院、旅馆都可看见。盟军应该让人民知道他们是严格但诚实的人，不伤害任何人、不侵犯妇女、不掠夺商店，也不否定任何人的正义，但仍然冷淡、高高在上，表现出就是主宰者的模样。这可教导德国男童在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优秀民族”，也让成年人明白这个道理。

战胜者花钱可以慷慨，甚至应该奢侈消费。一个人看起来越富有，德国人就越会认为此人是个老板。金钱仅次于制服，是德国人了解和接受的权力象征。个别的盟军军官、士兵和文职官员所有的费用要自付，但司令官不应该自己支付任何他们有权要求的东西。如果在柏林的盟军司令部要动用20节火车车厢，司令部就应该直接下令，不必担心该由谁付款或会打乱铁路的时刻表。

德国的政府体系在过去十年间变成最腐败的系统之一，纳粹官员可被收买，价码根据职位从一马克到一万马克以上。占领当局应当坚持要求德国履行义务，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不多不少，但就是不可放过，获取任何形式的情报都不应给予提供者奖励。

将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外国将军们可以不必使用如上的方法。德国人不得不服从，他们乐意服从，但是，如果这些军官保持个人的生活高标准，如果他们经常出入最昂贵的商店，入住最昂贵的旅馆，此举将大大增加他们身为治理者的权威。

了解德国人心态的人不会太在意这些事情，因为正如我在前面章节的解释，德国人永远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果平等对待他们，没有人能将外来的民主理想传授给德国人。



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于法国色当（Sedan）开打，普鲁士军队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史称“色当会战”。图中右方的拿破仑三世交出随身佩剑，以示投降。

德国人生活在众多纪念碑中，他们纪念着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役和不重要的国王。从此端到彼端，德国境内大部分的古迹甚至没有艺术价值。街道名称让人想起霍亨索伦王室和其他王侯的名字：国王广场、凯撒大街、坦能堡广场（注）、色当等等，这些街名都必须淘汰。德国60%的正式街名都来自国王、战役、将军和征服者，只有6%的街道是以知识界的人命名。这些知识分子是公认的伟大德国人，然而他们的名字大多数却不为人所知。1月18日是普鲁士王国建基之日，这个法定假日实在应该改为第一共和国诞生的11月11日才对。歌德的生日8月28日更应该取代希特勒的生日，成为法定节日。

战后的德国人至少在五年内不可离开国境。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之后曾派出无数间谍和特工前往国外卧底，这些活动的资金正来自战胜者借给他们的贷款。经由这些特工，所谓的凡尔赛“奴役条约”的错误想法灌输进了数百万名没有偏见的英国和美国平民耳中。当战败的德国从敌人的银行得到巨额贷款之际，我们却看到德国人在高速公路上开着新车，飞奔前往法国，所经之处可以看到遭破坏的地段、拆毁的德国大炮，而他们却在巴黎

最好的餐厅内庆祝。就在同一时间，法国人民却正试图节约，以重建遭到战争蹂躏的省份。

我们必须牢记，希特勒和他的军国主义者所做的宣传，让德国人对自身的效率更加深信不疑，德国与生俱来的傲慢因此增强，此时要说服德国人认为祖国受到委屈，以及受到“残酷的”《凡尔赛和约》的羞辱，再容易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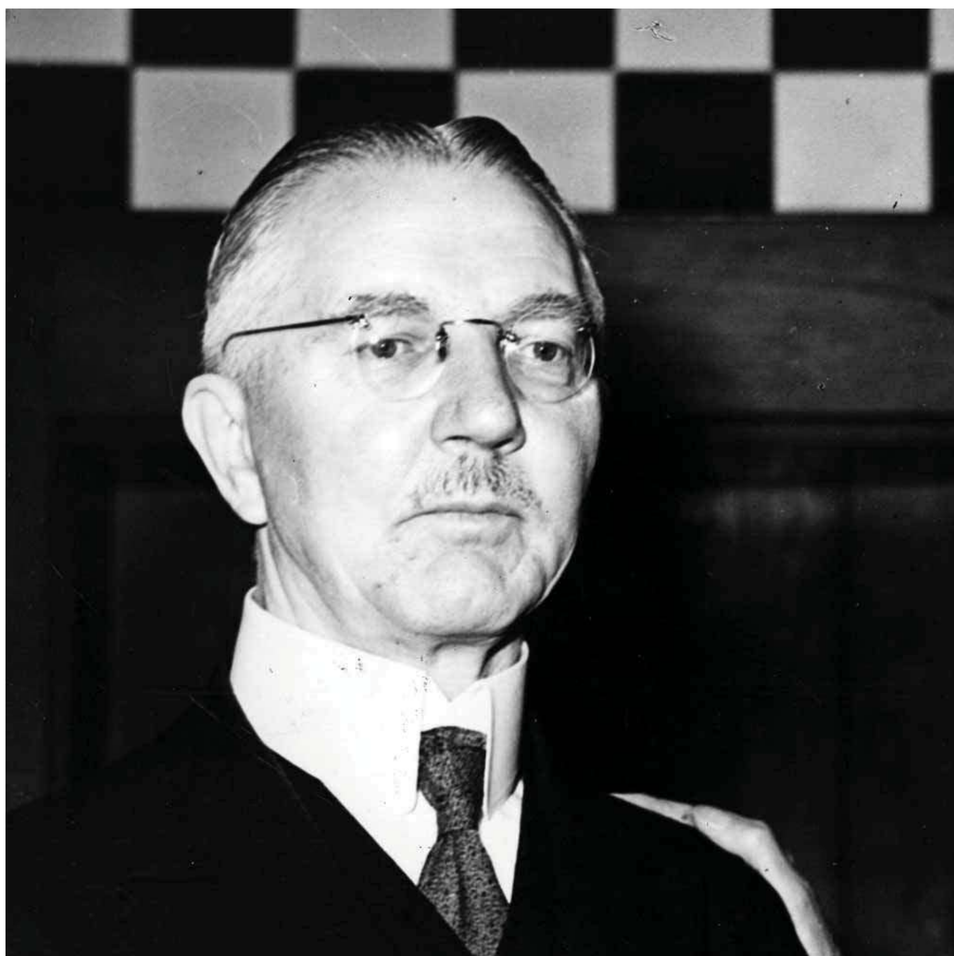
同样的事情不该重蹈覆辙，必须迫使德国看到是他们破坏了和平，他们必须表现出诚意。他们必须留在国内，因为他们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出境签证应该是发给必须参加国际会议的公务人员、在国外会议发表重要报告的科学家，或是可证明国外不同的气候能对他们个人健康有益的残疾人士与病患。德国商人或银行券商将无法再次蜂拥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的商品寻找新市场进行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贷款给德国工业家，导致德国再次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一回，德国的工业家在第一个十年必须按盟军的计划努力工作，以重建德国侵略造成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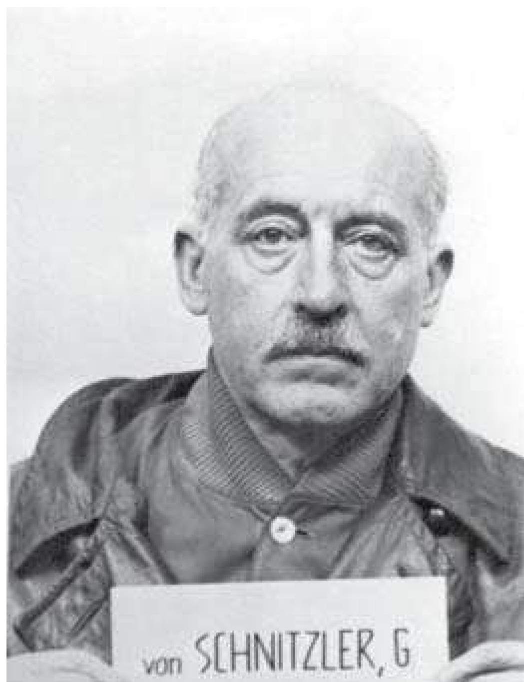
去年5月，一份关于三家美国公司和德国的法本公司（I.G. Farben）[注]之间阴谋的官方报告公之于世，总检察长在华盛顿首府表示：“国际卡特尔（cartels）未死，而是正计划继续他们目前和战后的活动。”如果美国或英国的民意或国会支持这项国际计划，并让德国人参与，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将是徒劳无益。此举不仅是对有罪的德国工业家的援助，甚至算是奖赏。

泰森家族、沙赫特家族、冯·施尼茨勒……率先资助希特勒的正是这些人，而且他们是在希特勒还未上台前就已开始资助；这些人是德国强化军备的背后支柱，而且公然支持复仇与征服的战争。这些人在1943年德国初露败象时就早已弃船逃亡。冯·施尼茨勒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公司——也就是法本公司的总裁，他也是陆军元帅冯·博克[注]的连襟。冯·博克将军在俄罗斯表现出色，是当今纳粹德国权力最大的人。

经过12年不停的战争，冯·施尼茨勒“突然发现”他厌恶他的纳粹朋友，于是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西班牙；现在他是“德国难民”，就像当德国与意大利和俄罗斯打了败仗后，有其他二千多名的德国工业家“突然发现”自己热爱阿尔卑斯山的花朵、瑞典的峡湾和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的大理石柱。



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银行家，曾在希特勒政府中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协助希特勒实现经济复兴、再工业化和重新武装的政策。



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1884—1962），他在担任法本公司总裁时曾主导公司资助希特勒政府，在战后成为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战犯。

这些人比纳粹更可恨，因为他们向来毫无信念，如今正在中立国家忙着重建他们和盎格鲁—撒克逊朋友的友谊，这些朋友曾在1943年救过他们，在1944年恢复商业关系。

这些德国工业家族摧毁了《凡尔赛和约》，而且协助德国重新武装军备，如今我们应该对付他们。所有德国工业领导人的权力都必须打破，不许他们任何一人重新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背叛了全世界的就是这些人或其父祖；他们一边哭诉着自己的国家“被奴役”，一边却还享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繁荣。德国的机器或引擎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得让过去那些计划奴役欧洲的德国人使用。这些命令必须由盟军委员会下达，他们必须规定要生产的种类、数量和目的。德国人不会被如同奴隶般对待，也就是不会像他们对待500万名欧洲工人那样。德国人的劳动会得到酬劳，而且也不会被驱逐出境，但必须打破他们的主导权。

文明国家的报复

由于音乐是德国最伟大的成就，德国的新主人应经常参加音乐会。音乐会曲目应该尽量包含德国音乐；至少就目前而言，不要强迫德国人接受外国音乐，而且剧院也应该完全让德国人持有。德国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因此，战胜者可以表明他们清楚歌德和贝多芬的伟大之处，而且毫不犹豫地尊敬德国过去出现的伟大思想家，让德国人看到盟军无意破坏德国国民的生活。

当然，新闻、剧院和电影院初期都必须接受盟军的审查，只要不抵触教育的主要目的，盟军应该在所有事务上主张自由，但是对于所有宣传种族仇恨、征服世界和国家主义的图片、书籍、杂志、电影和剧作，则要采取铁腕手段清除，尤其是纳粹在德国用作宣传的那些东西。

德国共和国在1918年所犯的大错，就是他们无法鼓起勇气彻底销毁眼前所有关于霍亨索伦王室、君主制与战败将军们的回忆。

文明国家的报复不能借助野蛮方式，但是考虑到德国人对奇特想象的沉迷，我们可以采用智识上的报复。所有纳粹文学都应投进大火里焚毁，同时，所有新的德国官员和盟军保护者都应列席观看。纳粹文学应该与19世纪那些毒害德国心智的所有书籍一同焚毁，其中包括宣传种族优越论、荣耀战争和统治世界的书籍，也包括张伯伦、伯恩哈迪和冯·隋特斯克等作家的作品。在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纪念日，应该有个焚烧他照片和《我的奋斗》的仪式，并公开朗读希特勒曾答应德国人，但却未兑现的承诺（比如统治世界及其荣耀）。另一方面，所有在1933年被烧毁的那些书籍，则应当重新放回公共图书馆。



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英裔德国政治哲学家，妻子是音乐家瓦格纳的女儿。其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成为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



冯·隋特斯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者，隋特斯克支持德国在普鲁士统治下实行统一的政策，并且以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立场著称。

每名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被纳粹投入牢中或集中营的德国人、每名可以证明自己挺身反对纳粹罪行的人，都应该受到奖励。由于德国人非常喜欢爵位和勋章，保护者应该鼓励创造新的头衔和爵位给在监牢和集中营里的英雄。“自由参事”（Freiheitsrat）也许是合适的头衔，而且也应为集中营幸存者设计一个勋章。

德意志共和国并未创造出一个带有徽章和勋章的等级制度，德国人对此极度怀念，希特勒建立了这样的等级制度，吸引到最早的追随者。德国人对制服和勋章的喜爱程度，可从最近受俘的一名德国将军看出——即使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他还是要戴上所有的勋章。

由于三个旧帝国的国旗代表的政治纲领会再度激发出嫉妒心，德国应该要有一面新国旗，也许纯白色的国旗很适合代表一个非侵略性的德国。

旧的德国国歌，例如《德国高于一切》注、《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守卫莱茵》注等歌谣，以及希特勒的歌曲《霍斯特·威塞尔》注必须淘汰。

新的德国国歌可以采用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欢乐颂》，这首合唱曲的旋律简单，可加入新歌词，无须改变贝多芬作品的任何音符。

如果盟军保护者打算承认德国抱有真正的民主信念，那么外国人应谨慎选择执政人选：烈士不一定是好的政治领袖，遭希特勒迫害的人不一定能成为和平的欧洲人。每名进入盟军保护者政府的人，其记录都应受到仔细的审查，特别是关于他在德国共和国期间的政治活动。有相当多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愿意在新德国工作，其中有些人目前在美国。这群人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煽动德国人，他们到现在还称之为“奴隶条约”。这群人太正派了，正派到无法成为纳粹分子，但他们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市议会是比较容易找到德国自由主义者的所在，这里可能是自由主义最早在德国生根的地方，也是最后一个弃守之处。我们虽然可在社会主义工会中见到善意，但当中罕有人才。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民众间向来没有权威可言，现在当然也不会有。他们擅离自己的岗位，甚至没有试图反抗纳粹去保卫共和国。只有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曾起身反抗，但却以失败告终。群众不会忘记这样的事实。

对孩子微笑

至于教育儿童则须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对于儿童，我们要有同情心、有耐心，我们可以微笑地对待儿童。基本原则是要将他们引导回自己历史上的伟大思想上，而不是唤起他们对外国民主国家荣耀的热情。这种新教育可以采用德国书籍，并由德国教师上课。这项大工程所需的素材德国都有，但都隐藏在纳粹毒手还没伸入的图书馆内，以及在一些安静无声的思想家头脑里。

德国青年不会轻易接受由翻译引进的外国思想。用他们祖先创造、尊重、收集、留给他们的艺术会更容易吸引他们。这些素材能吸引他们，并抵制纳粹的宣传。这种教育不乏书籍可用，因为德国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单单一个歌德就足以彻底再教育他的国人。

不能采用康德的著作教育儿童，但可以让他们从故事、图片及宗教教育里得到自由主义的思想。《登山宝训》注可能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能让年轻人疏远纳粹教义。年轻人被种族教条灌输了这么多年后，现在应该教导他们宽容的历史。在年轻一代的心中，必须首先彻底摧毁的，是一种认为自己的宗教、种族和国家比其他人优秀的信念。必须向孩子说明，国家不是生活的中心，不是身着制服的万能偶像，不是接受活人牺牲的摩洛

神[注]，而是如美国人所说，是一个帮助和护卫个人安全的组织。

应灌输他们宽容和责任感这两股相互依赖的思想，这会让他们承认并欣赏其他国家的思想，并延续和捍卫这些思想。

虽然投票权必须暂停一段时间，不过仍应告诉儿童，投票权是一项公民拥有的最重要权利。德国儿童公民不应再接受必须为祖国而死的教导，他们应该明白还是活下去比较好，并且就此深思。

让儿童到乡间放松，让他们学到德国人喜爱的农家生活、森林、钓鱼、划船。各国大型城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德国可以轻易地转移到乡间，因为德国年轻人有浪漫倾向；基于同样的原因，音乐也更能吸引年轻人。

作为种族意识形态的解毒剂，应让德国青年阅读歌德、席勒、赫尔德、莱辛的经典作品。歌德的《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注]、席勒的《唐·卡洛》和《威廉·泰尔》[注]、莱辛的《智者纳坦》[注]是几个应在德国舞台上演并在德国学校阅读的剧作。年轻人尤其应该熟读《智者纳坦》，因为它的内容包含关于宽容的教义。年轻人也应该阅读赫尔德，他是德国最伟大的民歌学者以及著名的外国流行诗歌译者。

在此无法一一详列关于德国儿童教育的课程。在任何情况下，学习越多的德国艺术和诗歌，就越能让儿童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感到骄傲。

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应该在德国禁演至少50年。这个有诱惑力的作品成功地在全球各地散播德国统治世界的思想。到了公元2000年，应该不会再有音乐爱好者能容忍这个如同怪兽般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演出需要四夜，每夜至少三个小时，如今许多伟大的音乐家虽然继续演出这个曲目，但对之却是厌恶不已。

德国曾经和其他国家（例如法国）一样，诚实地教授外国历史，但这个传统到了希特勒上台以后已被打破。现在必须回归传统。然而，德国人自家的历史课程一直是扭曲的，历史教材中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战争、征服及对征战的赞扬。更高的文化层面只有零星的课程。王子们被当成偶像般崇拜，课程大纲无视德国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成就，反而宣扬军事荣耀。

德国儿童应该从现在起学习自己国家的新历史，一种包括德国的征战及其知识分子成就的双重历史。过去那些不重要的小王朝及其无止境的嫉妒和王室间的差异可全数从课程中剔除，转而多教导有关知识分子及其伟大知识的内容。与其将时间花在背诵战役的日期和国王的名字，德国青年更应该学习德国伟大诗人、艺术家和发明者的生平。德国应当比较其他国家君

主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比较其他国家的革命背景，突显德国为何未能赢得自由。德国教室墙壁上的国王和将领照片应被那些诗人、作曲家、作家和科学家的肖像取代，但这不表示所有的君王都应该被亵渎，热爱进步与和平的国王应当被列举出来，以替代那些发动战争的君主。如此一来，德国青少年会慢慢地回到丰富的艺术和科学领域，开始憎恨那些掠夺财富的投机分子。

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扎实的知识之后，年轻人可开始学习外国文学和艺术，藉由比较其他国家与自己国家的伟大作品，能让学生对其他国家有熟悉感。以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其他民族和国家，这种态度可能会在成长中的青年心中酝酿成熟，使他们能以平静和开放的眼光看待外国和其理念，而不再以征服者的眼光放眼世界。

必须给予运动新的尊严，而且不得用仇恨腐化运动。从摇篮时期开始，儿童就应该学会公平竞争。应禁止生产军事玩具，例如士兵、枪支和坦克模型。这种方式能让青少年的想象力不会专注在战争上，儿童要学会尊重他们的新国旗。

除了外语教师以外，德国学校的教师必须是德国人。将由盟军的督察人员来控制每一所学校，让新的复仇理论没有任何生根发芽的机会。有破坏知识嫌疑的教师必须立即开除，并受到惩罚。课程大纲不应排除政治，而是要将之当成给14岁以上少年的特别课程；盟军应该表现出机智权术和主动的方面正在于此。

好学生可获许在若干年后访问其他国家，甚至获得奖学金；这些从海外归国的德国少年会受到钦羡，德国人的性格会受到向往事物的影响，出国旅行因此可以成为给予德国学生的奖励。

德国大学必须重组，尤其是大学教授。要消除表现在喝啤酒和举剑决斗上的条顿式荣誉理想，必得费上一段时间。德国大概有80%的教授会遭到解职，对于长期教授纳粹思想的人不能宽容对待，有些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前就已开始散播这些思想。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人的过往记录，而不是他们的要求或承诺。

我相信，管控和重组德国的学校是盟军战胜后要面对的首要任务。魏玛共和国的经验说明，没有战胜者监督的教育体系只会让一国故态复萌，再度相信民族优越的老信仰，从而发展出新的报复和战争理论。

有些人提议盟军部队在短暂占领之后就撤出德国，驻扎在边境外。然而，这个诱人的计划有两大危险之处。首先，你无法从外部影响德国的教育；再者，那些正在修复残破欧洲的德国劳工将无法安置。面对一匹狂暴不羁

的野马，驯服它要比将它圈在围栏内容易得多。

要如何处理在纳粹教育下长大的年轻人？这些从18到25岁之间的士兵约有200万人，必须给他们机会，以便找出他们是否能与新政府合作。

他们多数人都会迷失，并像数以百万已经丧命的纳粹分子一样战死。如果这些人无法重塑，那么盟军必须跳过这200万人，才能让世界进步。德国共有7 000万人，其中约800万是儿童；他们越年轻，就越有希望将他们争取过来。

教育家的理想不在于改变受教者的个性，而是开发其个性。歌德在晚年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自然本质训练成生产的能力。德国拥有一些好的自然本质，我们的任务就是抑止他们的邪恶本能，并发展他们的健全特性。

这是一项细密的任务，值得伟大的思想家关注。

---

1. 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2. 该船是20世纪30年代航速最快的船，以横渡大西洋为主。1939年大战爆发时正好停在纽约港。

3. 帕克·吉尔伯特（Seymour Parker Gilbert，1892—1938），美国律师、银行家和政治家。

4. 1914年8月，德军在坦能堡（Tannenberg）大胜。

5. 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是一家建立于1925年的德国化工企业，全盛时期曾是德国最大的公司。1931年纳粹党上台之前，法本公司曾向纳粹党和希特勒提供了大笔赠款，助其竞选，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由于曾涉及众多战争罪行，该公司在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

6. 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二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7. 《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出自《德国之歌》（*Deutschlandlied*），自1922年来即是德国国歌。

8. 《万岁，胜利者的桂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为霍亨索伦国歌；《守卫莱茵》（*Die Wacht am Rhein*）是源自19世纪40年代爱国歌曲，流行于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9. 此曲原名为《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作曲者是纳粹党员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在他1930年遭杀害后，此曲在1933年成为纳粹德国的国歌。

10. 《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指《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在山上所讲的话。

11. 摩洛神（Moloch）以火祭儿童闻名，上古时期盛行于地中海东南岸地区。

12. 《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auf Tauris*），原为古希腊经典悲剧，讲述一段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故事。但在歌德的改写中，不再突显神的主宰能力，而是转向对人的歌颂。

13. 《唐·卡洛》（*Don Carlos*）以16世纪西班牙宫廷为背景，表达通过开明君主施行社会改良的理想。《威廉·泰尔》（*Wilhelm Tell*）则以瑞士独立战争为背景，在歌颂民族英雄威廉·泰尔的同时，也歌颂争取民族解放的壮举。

14. 《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的故事背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耶路撒冷，讲述聪明的犹太商人纳坦、有学识的萨拉丁以及圣殿骑士，如何共同努力打破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隔阂。友谊、宽容和良好沟通是全剧主旨。

附录：宣言

1943年8月19日在蓝网[注]发表的演说：

……戈培尔告诉七千万德国人，他们都会遭杀害、灭种，或卖为奴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今最迫切的事，是让德国人知道盟军会如何处置他们。告诉他们事实，不要给他们怜悯的妥协。不要对他们说他们是被误导的可怜人；不要告诉他们盟军是他们的朋友和解放者。对意大利人来说，这可能合逻辑，但对德国人不然。

我们不应该对德国人说他们现在可以继续建立自己的自由政府。德国人民只听得懂胜利者或领主的声音。他们会嘲笑任何人道主义的想法，并说："这是一个新的威尔逊。"他们热爱服从，甚至胜利者也一样。我建议的宣言稍做改变，就可以印成传单，并用德国军人风格的声音广播：

德国的人们！现在是你们明白你们不是世界上最重要民族的时候了。许诺给你们的千年帝国就在今天已成废墟，千年帝国不过十年光阴而已。你们的军队非但没有统治世界，反而在各个战线都节节败退。你们的城市昼夜不停地遭到轰炸，你们的意大利邻居痛恨你们、痛恨战争。

我们要求你们投降，结束一场无用的战争。我们的军队会占领你们的国家并维持秩序。我们将努力阻止遭受你们侮辱的邻居不要复仇。我们会为你们带来和平、面包和正义。

这个意思是：

一、士兵和平民都停止战争行动。

二、在我们协助其他国家之后，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食物。

三、我们公正且有秩序，这和你们军队在欧洲各地违反一切法律所犯下的罪行截然不同。

德国人，你们都是这些罪行的帮凶。在1932年最后两场自由和专制的选择中，你们明知纳粹党的计划和他们所有的罪行，还投票支持他们，使他们成为德国最强的政党。你们的自由意志让一个毫不隐瞒手

段和目标的政党获得政权。最大党的领导人以最民主的形式被提名为帝国总理。此后，他才开始了一连串反宪法的罪行。

十年来，除了少数勇敢的牧师和工人，没有人起来反对他。没有政党、没有科学家起来反对元首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罪行。这是我们宣布你们有罪的原因。

但我们不是德国人，处罚7 000万人并非我们的意图。我们会仔细检查记录，确定有多少领导者有罪。公开审判后，我们会惩罚他们。我们会根据现代刑法处罚数百万人。处罚绝非报复，而是防止有罪者重复犯罪，并教育他们不能重蹈覆辙，以保护社会。

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不会谋杀或滥用审判监禁任何人。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不会侵犯妇女、我们不会掠夺你的家园。任何无罪之人都可以安身立业。

但是，我们将拿走你们所有的武器，你们的警察必须遵从我们的规则。你们已经向世界表明你们无法治理自己，所以，我们的接管政府会用坚定和正义来治理。服从法律和秩序的人可以无所惧，我们也会请一些你们最忠实的公民提供我们关于政府和管理的建议。你们学校的整个教育体系会在我们的管控下，德国教师仍可使用德语教课，课程内容都会根据被你们忽略太久的德国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的原则和著作而制定。

德国的人们，投降！拒绝服从你们现在的主人。起来，给我们一个信号。

这是最后通牒。如果你们因为欲望和冲动继续犯罪，那么我们不得已将只有从空中轰炸：我们将摧毁你们的城市，不留寸土。

德国人，决定你们的命运！

这样的宣布不会让德国人恐惧他们在投降后将成为奴隶，但却能让他们熟悉胜利者的声音。

---

1. 蓝网（Blue Network），美国NBC公司旗下的广播节目制作与发行网。1927至1945年间，蓝网的节目几乎遍及全美。